

台灣兩性關係暢銷書的翻譯與性別再現

李根芳*

摘要

本論文擬從性別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兩性暢銷書的翻譯與性別角色的再現。有關翻譯類暢銷書的課題幾乎鮮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學界對於暢銷書的研究可說是寥寥無幾，更遑論翻譯類的暢銷書了。但是近幾年來翻譯類暢銷書動輒銷售達數十萬冊，其普及的程度及影響力卻未獲得進一步的分析，對於了解台灣過去的文化、社會變遷，似乎是有所不足的。

本研究將範圍鎖定在台灣最早提出的金石堂排行榜名單，檢視自 1983 年最早的暢銷書排行榜名單迄今，翻譯類書籍所呈現的性別角色在台灣的暢銷書排行榜名單裡有何變遷，反映出何種性別文化政治樣態。過去數十年來這類翻譯作品有什麼變化？本土創作的兩性關係暢銷書在題材上和寫作風格上是否受到外來作品影響？隨著台灣社會的愈益開放，一般讀者對性別角色認同是否有不同的期待與想法？不容否認的是，台灣由於地緣政治關係，種種文化現象也深受日本影響，本研究限於能力、時間的限制，將對比的範圍限定在英美此類翻譯暢銷書和台灣作品的對比參照。

如果從性別研究的角度切入，我們也必須考量第一世界女性主義觀點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觀點之間的協商和衝突。本論文將針對兩性議題及性別再現來檢視這類暢銷書在排行榜上的消長，探討兩性關係暢銷書的翻譯與本土創作對台灣文化的性別再現有何影響。

關鍵詞：再現、性別角色、暢銷書、認同政治、文化翻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本文感謝助理蘇子維整理資料、王正廷協助翻譯。

Translation and Gender Representation of Self-help Bestsellers for Improving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Lee, Ken-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how women's role is represented in the subgenre of Taiwan's self-help bestsellers for improving relationships. Bestsellers are normally regarded as part of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tents are clichéd and formulaic, ye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y also reflect social changes, the public desir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Zeitgeist*. Though buying a book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book has been read, it at least shows what interests people. As American critic, Michael Korda, claims, the list is like a mirror that reflects who we are, what we want, what interests us. It can be seen as a map of the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crocosm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es. To further complicate the issues, translation has increasing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aiwan's publishing industry in recent decades. Yet, its impact on our culture and society has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Thus, I'll look at how domestic writers and translated works give guidelines to modern women and what image of women these self-help bestsellers portray and what impact they may have on women. To examin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s image in these self-help bestsellers, we can also tr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role throughout the recent decades.

Keywords: representation, gender role, bestseller, identity politics, cultural translatio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 前言

本文試圖檢視台灣的兩性關係類暢銷書如何再現女性。暢銷書通常被認為是通俗文化的一部份，其內容多半陳腔濫調、了無新意，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暢銷書同時反映了社會變遷、大眾欲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時代精神（*Zeitgeist*）。儘管買書並不代表讀了書，但至少這顯示了什麼議題令人感興趣。如美國評論家麥克·科達（Michael Korda）指出，暢銷書排行榜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麼、什麼讓我們感興趣...我們越深入研究，就越能從中看清——自己。」（2001: 224，粗體為原作者所加）另一方面，近數十年來翻譯類作品在台灣出版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其對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卻少有人進一步加以分析探討。因此本文將檢視本土作家與翻譯作品如何指引現代女性改善兩性關係，這類暢銷書又是如何刻劃女性形象，以及對現代女性造成何種影響。

美國文學批評家珍妮斯·芮德薇（Janice Radway）在其鉅著《閱讀羅曼史：女性、父權與通俗文學》（*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中指出：「羅曼史的普及也許可歸因於女性信念與需求的改變。」此外，她也提到書籍生產、銷售、廣告與行銷技巧等重大改變，對於羅曼史的普及同樣功不可沒（1987: 20）。雖然芮德薇關注的焦點為羅曼史，然而相同的假設也可套用在以女性讀者為主要市場的若干暢銷書文類。因此本文分析將借用她所提出的觀點，來檢視兩性關係暢銷書如何因應女性需求與信念的更迭而轉變。

傳統台灣社會中，性別角色的塑造受到中國與日本文化的影響。良好的女性的典範是服從被動，擔負所有家務責任。以字源來看，《說文解字》解釋「婦、服也。婦主服事人者也。」強調的即是順從之意。這與其他父權社會下規範的女性角色相去不遠。三從四德被視為女性的行為準則，所

謂三從指的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指的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普遍要求，要求女性的品行、言語、儀容與技藝，應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這樣的規範無非是在鞏固父權體制，旨在榮耀男性、壓抑女性。

三從最早見於儒家經典十三經中的《儀禮·喪服傳》，四德則是由東漢文學家班昭(西元 45?-117?年)在所撰的《女誡·專心篇》中提出，她也是中國第一位女性歷史學家。¹在過去，儘管絕大多數女性未必讀過這些經典，這些概念仍深植在傳統與日常生活之中。日本文化同樣崇尚服從婉約的女性，因此在日本殖民台灣期間，女性的地位並沒有很大的改變。

雖然呂秀蓮在 1974 年便發表《新女性主義》，推動女性解放意識，但是在戒嚴高壓氣氛下，並未造成全面風潮。直到 1987 年政府正式宣佈解嚴，婦女解放運動也隨之風起雲湧，長期以來被視為台灣理想的女性形象開始面臨挑戰。台灣社會在 80 年代面臨重大的轉變，自解除戒嚴令之後，對社會眾多巨大衝擊之一就是結束對出版與媒體的審查制度。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強烈求知慾一夕潰堤，強大的爆發力促使出版業蓬勃發展，各大出版社紛紛引介、翻譯許多不同種類，或是較大部頭的書系作品，1987 年首次授權中文翻譯的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即為一例。在性別議題方面，1987 年創刊的《婦女新知》以喚起女性自覺為首要任務，更為台灣的婦女解放運動帶來一番新氣象，繼之而來的是許多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者積極地推動改革，爭取兩性平權與女性福利。

在面臨新舊價值交替、社會結構劇烈變遷的情況，究竟何種書籍能為女性樹立新典範或指引新方向？什麼作品能創造女性新價值，並啟發她們因應不同的挑戰？為了回答上述問題，英語世界裡有不少女性主義學者從

¹ 有關婦女教育與三從四德規範的形成，可參考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一文。

事有關女性雜誌與羅曼史的研究。²在台灣，林芳玫的《解讀瓊瑤愛情王國》深入分析了台灣最受歡迎的言情作家作品及影響。近數十年來，台灣的學術界出現若干關於女性雜誌與羅曼史的研究，然而暢銷書的研究仍然付之闕如。³因此，本文將注意力放在以女性讀者為取向的非小說類通俗作品，特別是兩性關係的暢銷書。

隨著教育普及，女性讀者的比例愈益提高，許多女性熱愛閱讀，且閱讀的類別並不限於某些特定文類。在本文中我主要探討的是那些明顯以女性讀者為目標的暢銷書，不難想像鎖定女性讀者的書籍種類，絕大多數都是關於兩性關係、婚姻、育兒、節食及美容保養。換句話說，如何成為更好的女性（指的是更有吸引力、更快樂和更成功）是女性最關心的事情。

2. 台灣暢銷書榜的出現

金石堂是台灣第一家大規模綜合型連鎖書店，於 1983 年在台北市汀州路開設第一家門市，接著便陸續在全省設立分店。一開始，店面均以台北市為據點，之後才將觸角向北中南台灣各地延伸，到 2000 年全台已有 100 家直營門市。金石堂仿效美日，首創以電腦統計之「文學」、「非文學」暢銷書排行榜，於 1988 年正式公布發行。金石堂書店的出現，徹底地改變了出版產業及其行銷模式。它們展示與銷售書籍的方式，無疑帶來

² 珍妮斯·芮德薇、珍妮斯·溫席普(Janice Winship)、安吉拉·麥克蘿比(Angela McRobbie)、安娜·高夫-葉慈(Anna Gough-Yates)、嬌可·赫密斯(Joke Hermes)等人對此領域貢獻良多。

³ 以碩博士論文為例，在國家圖書館網站上可以找到 47 篇關於女性雜誌、16 篇關於羅曼史的研究，以言情小說為題的研究亦有 18 種。搜索日期：

<http://etds.ncl.edu.tw/>, retrieval : 28/10/2009。

了書籍封面設計、書籍分類（通俗文學與精緻文學的劃分從此更加地涇渭分明）的革命，出版者、銷售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也有了截然不同的風貌。

科達觀察美國百年來暢銷書排行榜的更替時指出，某些特定種類的通俗小說通常銷路不惡，「至於減肥書、勵志書、名人回憶錄、聳動的科學或宗教玄想作品、有關寵物的故事、醫療保健...等」也往往有不錯的成績（2001: xii）。暢銷書排行榜彰顯了美國社會普遍關心的議題，台灣的暢銷書排行榜自然也不例外，與美國暢銷書相比，既然彼此的社會有所不同，兩地的排行榜也勢必會有所差異。然而，自八〇年代開始，越來越多英美暢銷書籍被翻譯引進台灣。本論文旨在研究與性別議題的相關的作品，如兩性關係、性、婚姻類書籍，除了檢視本土作品，我也試圖對這類作品有那些是翻譯作品，在什麼時間以什麼形式引進、它們又是如何被翻譯，以做進一步的梳理與分析。囿於筆者語言及能力有限，因此將範圍鎖定在英文作品翻譯與本土作品的比較，而不擬討論對台灣通俗文化影響甚鉅的日本作品。在文類方面，如前所述，由於小說類的相關研究，特別是羅曼史，已有不少學者關注投入，因此本文亦不擬討論。本文的主題將限制在非小說類文本，檢視台灣暢銷書榜上本地作家與翻譯作品在兩性關係類暢銷書的對比與消長。

必須附帶說明的是，除了金石堂書店的暢銷書榜之外，其他的連鎖書店也紛紛在 90 年代推出自己的暢銷書榜，如何嘉仁書店、新學友書局、博客來網路書店（這是台灣最大的網路書店），以及晚近新加入的誠品書店，後者強調市場區隔鮮明的暢銷書排行榜，以及針對高知識族群的精英小眾市場。本文將以金石堂書店的暢銷書榜為主，儘管許多人批評其書榜不具權威和可信度，但我認為這個排行榜歷經二十餘年的積累，排行榜單的消長變化提供了充足的資料以供本研究進行分析。儘管數據未必百分之

百精確，榜上有名仍可證明這些書籍的受歡迎程度，因此該排行榜在做為反應社會變遷的參考面相上，仍然具有分析討論的價值。

3. 兩性關係暢銷書的發展軌跡

以下本論文將兩性關係暢銷書榜的歷史，劃分成三個時期來討論：(1) 1983-1991年；(2) 1992-2000年；(3) 2001-2009年。在第一個時期，我們可以從暢銷書榜上看見此特定文類中，最早的「品牌」浮現。在這個時期裡，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台灣出版業從一個較保守、教條取向的產業，轉變為資本主義傾向的企業。

在第一個階段裡，即1983年至1991年間，以金石堂年度排行榜的統計來看，薇薇夫人、黃明堅、楊小雲是此文類中最受歡迎的三個作家。薇薇夫人所著《一個女人的成長》(1985)，自發行後，便在排行榜上維持不墜，最高的名次是第八名(1988)，連續進榜八年。其次是黃明堅的《單身貴族》(*Single Noble*) (1989)，甫出書即上榜，是蟬聯六年的常勝書，最佳名次是第六名(1990)，另一本著作《為自己活》(1990)也連續進榜五年，並且在1991年締造第一名的傲人表現。楊小雲的《擁有自信就是美》(1991)也是一出書即上榜，創下當年暢銷排名第七的佳績。他們的作品代表三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並向女性提倡不同的性別角色。

薇薇夫人最著名的著作首推《一個女人的成長》，從書名即可連想到她所倡導的是現代社會裡的模範女性，她獨立自主、熱愛學習。從某個角度來說，薇薇夫人的作品與美國專為女性解答困惑的專欄「親愛的艾比」(*Dear Abby*)非常相似，她一開始也是台灣報紙的專欄作家，解答讀者的來信並給予建議。她的專欄固定刊登在當時國內兩大報之一的《聯合

報》，時間長達二十六年。她雖然強調女性自主意識與主體性，但同時提醒讀者找到另一半，有一個安定的家庭生活或許還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在她的作品中，特別有趣的是她對母親角色的看法。與傳統母親形象的再現大相逕庭的是，她探討了不負責任、不成熟的母親等，這樣的嘗試贏得許多讀者感同身受的支持。許多讀者反省自己身為母親的不足或壓力，有些讀者也從薇薇夫人的作品裡瞭解到她們的不幸福或許是來自於不快樂的母親。這和過去一再強調母職是女性唯一出路，或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顯然有所扞格。

另外一個「名牌」暢銷書作家黃明堅，則創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份認同——「單身貴族」，引起了正反兩面極端的評價。這個新概念宣示了一種新的思考模式：女性不一定要是家庭主婦，才算是完美女性。這個名詞暗示著她可以是單身不婚，而像一名貴族一樣享受生活。無論是在她的作品裡或是在各類訪談中，黃明堅均強調自己在年輕時即決定不婚，而這是一條絕對值得追尋的道路。她也在文中暢談自己到世界各地旅行的經驗，從她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懂得享受生活，並擁有經濟、行動自主權的自由女性。

她在《魅力十足》裡，不僅給女人建議，也對男人提出忠告：「女人不再單單為了男人而存在，為男人、為孩子、為家之外，她們也要為自己而活。而男人也許可以接受她們為家、為孩子、為男人所付出的心，但是不是同樣可以接受她們為自我成長、自我肯定所投入的血汗呢？」（1991: 165）她特別強調「溫柔是對人的最大尊重」，這樣的特質應該不分男女，這番論點打破了過去「溫柔是陰柔或女性特質」的看法，也驅使一般社會大眾思考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的分野與重新定義的可能。

的確，劇烈的社會變遷為女性創造了種種可能性，不可否認的是這也為社會的男男女女帶來許多困惑與焦慮。楊小雲較知名的作品如《她的成

長》(1988)、《人緣·情緣》(1989)、《擁自信就是美》，強調這些改變無法逆轉，但她擁抱的是較傳統的價值觀，為現代女性提供較溫和的改革典範。比如說，在《人緣·情緣》裡，她就對於當年風靡一時的新觀念「單身貴族」頗有微辭，她認為單身並不等於貴族（這裡必須指出，所謂的單身貴族只用來指稱女性，男性通常不納入討論，這是另一個有趣而值得探討的現象）。她並且嚴厲批評時下的「舞男現象」，指出這種現象是社會毒瘤，應該要被徹底根絕。在談到婚外情時，她指出女性永遠是受苦的一方，因此提醒女性小心提防，絕對不要身陷其中。

這些暢銷書之所以在當時風靡，自然有其成因。這和當時的教育普及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女性得到更多教育機會，當她們畢業後，新興轉型工業化的台灣社會需要大量勞力，因此就業市場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八〇年代許多女性受到較好的教育並得以在經濟上獨立自主，這些書名投其所好，對於在家庭與職場、傳統賢妻良母與現代職業女性兩種角色間掙扎的女性，提供了各種良方祕法，在某種程度上撫慰了她們焦慮不安的心靈。

到了第二階段，即 1992 年至 2000 年間，八〇年代末期解嚴後強大的爆發力已逐漸沈穩下來，性別議題的討論愈益多樣化與尖銳化。本論文之所以選擇以 1992 年做為第二階段的開端，主要是因為張老師出版社在這一年出版了《金賽性學報告》(*The Kinsey Institute New Report on Sex*) 系列三書，從此改變了台灣主流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尺度，也從此掀起了主流媒體熱烈討論情欲的風潮。就本土作品而言，九〇年代初期楊小雲的作品持續發燒，曾連續數年有多本書同時進榜，不過有些作品以勵志為主，未必涉及兩性關係的討論。後起之秀吳淡如則是此文類的新星，她在二十歲時出版第一本小說，迄今著作逾八十餘種，其中四十餘本是關於兩性關係與追求幸福的勵志書，另外還有三十八本小說創作。

她第一本探討兩性關係的著作，也是一出書就進榜。光是從書名即顯示出她與前人的切入角度不大相同，《認真玩個愛情遊戲》(1995)，藉由連結愛情與遊戲，來強調女性掌握性自主權，願意和對方有性關係的原因不是為了換取承諾，或是作為愛情的誘餌，而是因為女性本身樂在其中。這種看法與九〇年代中葉起愈來愈多女性強調性自主的趨勢互相呼應，在主流論述裡，女性對自我身體的態度明顯跟過去大不相同：性快感、婚前性行為與性自主，已成為女性展現自我情慾的表現，而不是刻意壓抑或必須捍衛防守的最後一道防線。

除了過去單一作者給予讀者忠告的作品外，媒體人李濤和李豔秋夫婦也連手傳遞成功婚姻與事業兼具的祕訣，1991年首先出版《親愛關係》，連續兩年上榜，1995年又再出版《親愛關係II》，但成績就不如第一集耀眼。不過，這樣的嘗試也顯示了事業有成的女性未必是以放棄婚姻為代價，他們的作品就是向社會大眾展現，一個成功的女性只要有體貼成熟的伴侶支持，同樣可以面面俱到。

在此之前，兩性關係的翻譯作品並不常見，即便偶有出版，也不易攻進暢銷書排行榜。九〇年代的出版市場積極擴張，競爭愈形激烈，市場上出現較多此文類的翻譯作品，並吸引更多讀者。雖然利奧·巴士卡力(Leo F. Buscaglia)的《愛生活學習》(*Living Loving and Learning*) (1982)是第一本在台灣極度成功的勵志類翻譯作品，但和兩性關係與性別角色並無直接關係。在心理勵志類書籍一直扮演領導角色的出版社——張老師出版社，於1992年發行《金賽性學報告》(*The Kinsey Institute New Report on Sex*)系列三書(1992)與《海蒂報告》，前者締造了銷售量超過六十萬冊的驚人數字，並於1993年被選為該年度最具有影響力的十大作品之一。此系列作品的出版震撼了社會大眾，其內容單刀直入地討論性慾與性衛生議

題，大大地開啟了讀者的視野，此類書籍也從此更為人廣泛接受，且內容也更加直接露骨。

早在張老師出版社出版這類作品之前，台灣學者與社會運動者何春蕤即已出版許多關於性自主的書籍，並批評婚姻是鞏固一夫一妻制及父權體制的陋習。她的重要著作包括《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性政治入門》(1990)、《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1994)等。特別是後者在當時台灣的主流媒體與學術論壇上都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相關的論戰於 1997 年結集出版，書名為《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總結「女性主義的『性』解放」的階段性成果。另外，1994 年 5 月 22 日在「反性騷擾大遊行」，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也為這波強調「情欲自主」的論爭，帶來更直接的衝擊與挑戰，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也從此邁向一個新的分水嶺。⁴

這樣的趨勢至少延燒了數年，因此金石堂 1995 年《出版情報》十二週年紀念特刊在回顧過去一年出版業發展時，還特別指出「情色書掀起出版新風潮」(1995: 37)。在國外成長，1995 年返台主持廣播節目的「非常 DJ」黎明柔在節目裡大膽談性，之後更出版了《非常話題——情色男女 + 做愛做的事》，除了兩本書外，還附加 CD，是 1996 年排名第九的暢銷書，「非常話題」果然話題性十足。除了勇於談論性，女性也將更多注意力放在身體與美貌。許多關於節食、瘦身和美容保養的暢銷書，在市場上帶動了新風潮。儘管美國早在 1950 年就有《青春永駐，延年益壽》(*Look Younger, Live Longer*) 這類書籍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台灣的市場則到九〇年代才逐漸對這塊未開發的領域開疆闢土。

⁴ 可參見卡維波所著的〈「婦權派」與「性權派」的兩條女性主義路線在台灣〉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theory/difference.htm> (搜尋日期：02/27/2010)

這一時期出版社之間的競爭也越發激烈，一些出版社試圖發掘明日之星以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其他出版社則寄望透過譯介外文暢銷書，締造銷售佳績。畢竟外文暢銷書原著必有吸引人之處，翻譯成中文應有較高的勝算來打動讀者。除了前述以聳動的性話題帶動買氣外，這個時期最成功的兩性關係暢銷書是美國作家璐西·莎娜（Lucy Sanna）與凱西·米勒（Kathy Miller）的系列叢書。

這兩位作者都曾與大企業合作，專精於市場調查與溝通，他們的「浪漫指南」系列，包括《如何讓你浪漫一生》（*How to Romance the Woman You Love: The Way She Wants You to*）（1997）、《用一輩子來經營浪漫》（*How to Romance the Man You Love: The Way He Wants You to*）（1998）是兩性關係書籍中相當暢銷的翻譯作品，第一本在1997年是排行第六的暢銷作品，1998年排名第二十三；第二本甫出版即躍升第十八名。顯然「浪漫」非常能夠打動讀者，因此兩人乘勝追擊，成就了「浪漫」系列。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運作邏輯與婚姻關係的經營努力似乎不謀而合，「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理可證明「沒有不勞而獲的美好兩性關係」，因此這類書籍往往形成系列出版，甚至衍生出許多相關產品，幫助人們改善與另一半的相處之道。

另一個作者約翰·葛瑞在台灣的命運就比較不那麼順遂，他的第一本暢銷書《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在美國非常受歡迎，於各大暢銷書排行榜上高居不墜，盤踞排行榜前三名長達五年之久。有趣的是，這部作品的中文翻譯最早於1994年出版時，並沒獲得太多注意，直到2004年出版商將其重新設計與包裝後，並且將書名改為《男女大不同》，之後才如獲新生，自此其他系列書籍也陸續引進，並未在排行榜上缺席。

到了第三個階段，即 2001 年至 2009 年，出版業的發展趨勢大致上與前一時期的腳步並無二致。本文之所以將 2001 年做為此階段的開始，主要是本土暢銷書作家吳若權的作品《愛情左岸》在這一年出版，這或許不是他最知名的作品，但作品內容所透露的訊息卻開啟了一個嶄新方向。這個階段大致而言，與過去十年的差異主要是有更多本土男性作家開始投入相關書系的創作，因此在兩性關係暢銷書排行榜上經常可見到男作家的身影。吳若權可說是近十年暢銷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愛是一生的功課》（1997）是 1998 年的排名第三十五的暢銷書，《那個男人不偷心》（1997）也在隔年進榜。他不僅為異性戀男女提供建議，在《愛情左岸》（2001）、《愛在魚水交歡時》（2005）裡，也對同性戀男女給予建言，探討情感與情欲相關議題。這項創舉也獲得了讀者的肯定。從他的作品可說是暢銷書同義詞的現象看來，我們可以發現同志意識已進入主流的思維模式之中，一般社會大眾顯然也較過去更能接受相關議題。

此外，他對兩性關係及婚姻的看法，顯然也與二十年前的楊小雲極為不同。以該書其中一篇文章〈栽培第三者〉為例：

「不肯放手的人，才是栽培第三者的幕後黑手。...當你發現：一段感情走到『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里程時，半路又出現了第三者，經過誠懇的溝通與努力之後，無法挽回，不如放手。」給女人的叮嚀：當妳對感情的努力，可能變成對「第三者」的助力時，請記得：省點力氣！給男性的忠：真正的感情，不需要用到「挽留」這兩個字。當一份感情需要「挽留」時，大勢已去。給同志的祝福：與其「當局者迷」，不如「旁觀者清」。將未完成的愛，留給記憶。（2001: 82, 85）

如果在過去，第三者幾乎是罪無可赦、人人撻伐的目標，在這裡吳若權反而勸告在婚姻裡的人也許該學會放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紀登斯在

《親密關係的轉變》裡所描繪的社會現象。

對同性戀情的討論、對第三者的同情，展現了吳若權「談情說愛」更大的包容力。2007年出版的《新 Love 學—加點理性更浪漫》裡，吳若權在〈除了性愛還要別的〉這篇文章裡，對女性性自主提出了符合時代潮流與觀念的建議。他以兩位女性朋友的經驗為例，提到她們和男友平常工作繁忙，一約會就是直接去賓館，做兩個人都愛做的事（2007: 216-7）。他的建議是，上完賓館之後，總要再一起去做點兩個人都會開心的事，才不會覺得約會只是單純為了滿足性需求。和過去相關論述主張「男人只要性、女人只要愛」，他告訴我們性與愛都很重要，如何維持均衡，才能使關係長長久久。

至於上個階段的暢銷作家吳淡如，到了新世紀仍然持續創作兩性關係類作品。除了以電視節目主持人、電台主播與報紙專欄作家等身份，為女性提供兩性關係方面的建議之外，也擴大領域，針對人生哲學、時間管理與如何成功撰寫相關的勵志書籍。一方面她是傑出的專業女性，但是在媒體上談論她的離婚過往與弟弟過世的私人情事，她也不畏懼在媒體上展現脆弱的一面。從種種的自我呈現看來，她似乎強調在現代社會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女性，並不需要放棄，甚或犧牲自己以成就他人。一個現代女性能以陰柔的方式展現強悍，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否有伴侶關係，都應該接受自己、肯定自己。這和七〇、八〇年代兩性關係的暢銷作家所強調的「讓心有所屬」的態度顯然有極大的不同。

在全球知名的兩性關係暢銷書「品牌」中，以來自澳洲的皮斯夫婦（Allan & Barbara Pease）和美國的約翰·葛瑞(John Gray)最為暢銷，他們作品的中譯本近幾年來在台灣相當受到歡迎。皮斯夫婦的兩性關係暢銷書目前也以書系行銷，如《為什麼男人不聽，女人不看地圖》(Why Men Don't Listen and Women Can't Read Maps) (2000)、《為什麼男人愛說謊，女人愛

哭》(*Why Men Lie and Women Cry*) (2004)、《為什麼男人愛劈腿，女人愛嘮叨？》(*Why Men Can Only Do One Thing at a Time and Women Never Stop Talking*) (2006)。只要一出版都是當年度的暢銷書，第二本更連續兩年進榜。

約翰·葛瑞因「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系列(2004)而化身為兩性關係的諮商專家，繼暢銷書系大獲成功後，他更進一步成立講習班，並設立提供輔導、諮商和兩性交流的龐大網絡。台灣目前已經引進和翻譯他的大部分著作，其風尚所及，一時之間，不少媒體均以「男女大不同」做為討論性別差異的招牌標語，「金星、火星」更成了男女有別流行隱喻。他的「男女大不同王國」更將版圖從兩性關係的感情、性愛，拓展至職場、親子教養、醫療保健等領域，儼然是開啟人生幸福鎖鑰的精神導師。

近兩、三年來，台灣的出版社除了引進皮斯夫婦與葛瑞這類全球知名品牌外，為了尋求多樣化，各大出版社近年也尋找英語之外的明星作家，以另創新局，例如南韓⁵、德國、西班牙等，藉由譯介這些地區及語系的暢銷書作品，出版社也可能同時引進了各個社會裡有關兩性關係與女性角色的創新想法與概念。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使壞」，現在已成為一個無論對男性或女性都極具吸引力的特徵，對女性來說，宣稱自己是「壞女人」，其社會意義更加重大。在父權社會中，壞女人指的是具有致命吸引力與令人著魔的蛇蠍美女，往往被妖魔化。然而，隨著時代改變，「使壞」的特質被視為是項優點，反而更增添某種性吸引力，這也許是後女性主義的結果。最具

⁵ 南韓作家南仁淑的作品《二十幾歲，決定女人的一生》(2006)、《二十幾歲，可以改變女人的一生》(2007)，在南韓銷售量都超過四十萬冊，他的兩本著作被翻譯成中文，且頗受歡迎。代表韓國熱也從影音產品延燒至出版業。

代表性的便是台灣本土作家女王的作品，她的《我是女王——那些好女孩不懂的事》（2007）、《我是女王 2——那些壞男人教我的事》（2007），都進入排行榜前十名。她從網路部落格作家起家，擁有五萬名網路讀者的支持，因此將部落格文章結集成書，成為暢銷書作家，也打造出「壞女孩」（*femme fatale*）形象。影響所及，連另一暢銷作家吳若權也借用「女王」一詞，寫了一本《做感情女王，別做戀愛女僕》（2009）。

4. 兩性關係暢銷書的消費

從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暢銷書的生產、消費與再生產是值得深思的課題。若是再加上翻譯所牽涉的複雜面相，我們還必須去思考翻譯類暢銷書籍如何從源語文化傳遞到目標語文化，除了語言的轉換和交流外，文化差異、行為價值觀如何被翻譯到另一個文化裡，更是棘手的挑戰。暢銷書籍不僅是文化產品，也是一種商品，許多人認為暢銷書榜被制度化，並且操控大眾的喜好與品味。我們在翻譯美國與其他國家暢銷書的同時，不僅只是進口這些「商品」，也引進了不同的想法、價值觀和思考模式。

就性別議題而言，台灣的女性解放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經由學術圈和出版界引進西方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而獲得推波助瀾的效果。第三波女性主義強調女性間的文化差異，因此倡議者主張，把第三世界女性當作是一個單一整體，且往往將其視為無助等待「進步、現代」的西方女性主義者啟迪的受害者，這種觀點大有問題。因此，我必須特別強調，除了文化與語言的差異之外，各個社會之間的性別角色也有所不同。這些英語世界暢銷書裡的性別再現如何翻譯，被引介到台灣的社會脈絡？讀者是否因為好奇而購買暢銷書，並從這些西方異國風情中得到想像的滿足？抑或我們

的讀者從這些作品中找到學習榜樣，並認為國外女性更加進步自由？某些問題或許需要從讀者接受（例如芮德薇的羅曼史讀者研究）的角度切入，才能得到答案。目前，我試圖以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親密關係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中探討現代社會的性、愛與慾的模式，來探究女性角色的再現與社會變遷的關連。

審視公共知識份子詹宏志九〇年伊始，發表在國際時尚雜誌《哈潑》（*Harper*）中文版創刊號上的文章〈九〇年代女性新特質〉，或許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性別角色的改變。他描述八〇年代女性作家的發展與表現，並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中一個現象是，某些女性作家對女性權利與性別不平等的議題較為自覺，並直言不諱。其二，許多作家的作品挑戰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之間的界線，例如蕭颯、蕭麗紅與廖輝英的作品都非常受歡迎，但同時也碰觸了嚴肅的兩性議題，並引起學術界的熱烈討論。

女性作家亦將陰柔纖細的感知與觀察融入作品之中，即便她們的主題是社會批判或研究報告，如龍應台與胡台麗，都可見到與過去男性作家風格不同的書寫策略，值得一提的是兩人都擁有博士學位，同樣深受知性傳統薰陶，而這樣的傳統在過去通常以男性較具可見度及主導優勢。以詹宏志的話來說，這時期的許多女性作家也是「議題製造者」，例如馬以工與韓韓著重環境議題，施寄青、黃明堅從迥異以往的角度討論兩性關係與婚姻問題，陳怡真關懷雛妓與性工作者，胡茵夢致力推動新時代運動（*New Age*），這些女作家不僅改變了一般讀者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認知，更引進新的概念，挑戰主流意識型態。

其他的趨勢則較市場取向，其中之一為都會女性文學的出現，女性作家描述都市中產階級女性的生活與愛情，如香港的暢銷小說家亦舒與李碧華的作品都非常受歡迎。此外，若干出版公司將作家包裝塑造為超級巨星的形象，刻意地把修飾過的女作家照片印在封面上，打著「美女作家」的

招牌，來吸引讀者，這樣的行銷策略，配合書籍內容以言情、通俗為號召，似乎也頗具成效。有趣的是，她們被貼上紅唇族的標籤，代表她們是外貌迷人的女作家。

詹宏志觀察了當代女性寫作的題材與書寫方式，指出女性角色與上一個世代確實有所不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發現不僅女性的角色改變，男性的角色也隨之轉變。因此，當科幻小說作家張系國提出男性版的三從四德，逆轉了女性的順從美德，強調當今男性的三從四德是為了滿足女性的需求與利益，也就不令人意外了（2006: 1-3）。現在有愈來愈多兩性關係暢銷書作家認為，溫柔體貼是男女都應具備的優點。

讓我們再回到紀登斯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中所提到的論點，這有助於我們繼續深入討論。他表示，「兩性之間平等的程度越高，所謂陽剛或陰柔的特質就愈可能融匯為一，變成某種兼具兩性特質的模式。」（1992：198）他並未否認當前性別政治中刻意強調差異的復興趨勢確實值得注意，但是更值得關注的是，「性別認同越來越傾向是一種生活形態的議題。」（1992：199）據此，我們可以瞭解兩性關係暢銷書的出版軌跡，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大眾需求，讀者閱讀這類書籍以尋求指引，或確認他們的作為或是欲望，合乎社會大眾的價值觀。

我們不要忘了，中產階級是大多數暢銷書的主要消費者。因此這些作品所揭露的主流價值或多或少與中產階級的需求和渴望相符。從這些兩性關係勵志類暢銷書的出版軌跡中，我們可以發現，早期女性開始在政治與經濟上獲得平等。接著，女性對其職業生活與權利越發堅定與自信，但仍嘗試在兩性關係中尋找答案。無怪乎許多暢銷作家樂於給予建議與諮商。

從早期以本土作家為主的創作，到了九〇年代開始，愈來愈多有關兩性關係「教戰手冊」的翻譯作品被引介進來，直到二十一世紀本土作家與外國作者同時在台灣出版市場上蓬勃發展，我們可以看見這類的討論更加多

元。各家暢銷書排行榜單甚至也針對這類書籍另闢一個類別，凸顯出這類書籍廣大消費市場潛力。早先本土作家對於某些敏感議題不是避之不談，便是以道德口吻加以譴責，自從何春蕤首開風氣，加上各種外來作品的刺激挑戰，目前各家作者可以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綜而觀之，過去十年來，女性更加開放與直接地表達對快感的追求，挑戰了傳統的女性角色。她們在兩性關係暢銷書中尋求的幫助，可能來自於這些書籍看似客觀的分析，這些兩性專家與顧問嘗試以更科學或系統化的方式來解決她們的問題。特別在那些翻譯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多數的暢銷作者都是專業人士，不是擁有博士學位就是從事行銷、企業顧問，可以說是溝通的能手，提供兩性關係遭遇問題的讀者最佳協助與建議。在體制裡受過教育、具有專業能力的中產階級女性，較易以這種方式被說服與得到安慰，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唐恩·史雷特（Don Slater）所述，在西方商業、西方市場與西方生活方式的發展上，消費文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97: 8-32）。在這篇論文裡，我試圖從兩性關係暢銷書本土作品與翻譯作品的對照比較切入，探究作為文化產品與商品的暢銷書如何被市場與大眾媒體創造與操控，其中刻劃的女性性別角色再現如何與社會脈動扣連呼應。⁶讀者購買閱讀這些暢銷書時，或許某些渴求欲望得以獲得滿足，而在有意或無意間，可能也接受了隱含其中的價值觀。

⁶ 請參考拙著：〈中西有差異，男女大不同？〉。《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專刊》。（2005）No. 31: 12-19。〈翻譯類暢銷書在台灣的文化政治〉。《翻譯與跨文化交流：轉向與拓展》首屆海峽兩岸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2007）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76-190。

參考書目

- Appadurai, Arjun.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 Asad, Talal.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6.
- Bernstein, J..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R. Johns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3.
- Brennan, Timothy.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 MA: Harvard UP.,1997.
- 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 DeKoven, Marianne. 'Cultural Dreaming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27.1(1996): 127-44.
- During, Simon. 'Popular Culture on a Global Scale: A Challenge for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Inquiry* 23(1997): 808-33.
- Featherstone, Mik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 ,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 Sage, 1995.
- Frow, John.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Value*. Oxford: Clarendon, 1995
- Giddens, Anthon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1992
- Hackett, Alice and James Henry Burke. *80 Years of Bestsellers, 1895-1975*. New York: R. R. Bowker, 1977.
- Huggan, Graham.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 Jameson, Fredric and M. Miyoshi. eds.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P, 1998.
- Korda, Michael. *Making the Li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Bestsellers, 1900-1999*.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2001.
-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 Miner, Madonne. *Insatiable Appetites: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Women's Bestsellers*. Greenwood P, 1984.
- Radway, Janice.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U of North Carolina, 1987.
- . *A Feeling for Books: The Book-of-the-Month Club, Literary Taste, and Middle-class Desire*. U of North Carolina, 1997.
- Shuttleworth, Mark and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Sklair, Leslie.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Oxford: Oxford UP, 2002.
- Slater, Don. *Consumer Society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 1997.

Twitchell, James B. *Carnival Culture: The Trashing of Taste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2.

Venuti, Lawrence. 'Unequal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9.4(1997): 360-8.

-----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卡維波、何春蕤《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性政治入門》，台北：方智，1990。

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1994。

何春蕤〈情慾文化〉，《張老師月刊》，1995：2，132-134。

何春蕤編《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1997。

李根芳。〈翻譯類暢銷書在台灣的文化政治〉。《翻譯與跨文化交流：轉向與拓展》首屆海峽兩岸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176-190。

張系國。《女人究竟要什麼》台北市：洪範書店，2006。

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鮑家麟編著。台北市：稻鄉出版社，1991。頁 259-286。

詹宏志。〈九〇年代女性新特質〉原刊於《哈潑》創刊號。《出版情報》1990年3月，No. 23: 4-5 轉載。

《出版情報》台北市：金石文化廣場。(1988.05-2007.03)

《出版年鑑》台北市：行政院新聞局。(2003-2008)

翻譯、番易、褪色的現代主義： 以王文興《家變》英譯本為例

劉建基*

摘 要

本論文以杜玲英譯的《家變》*Family Catastrophe* 為例，闡釋王文興的中文原著如何經過文化翻譯形成一部褪色的「現代主義」譯本。論文旨在析論英譯本如何透過「歸化」策略，形成一種嶄新的「建構體」。此外，論文將闡明英譯本如何展現「差異性重複」，形成一個「看似神似卻不盡相同」的相異主體與「番易」文本。

關鍵詞：翻譯、番易、王文興、家變、現代主義

* 世新大學英文系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Faded-out Modernism:
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ang Wen-hsing's
*Family Catastrophe***

Liu, Chien-ch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how Wang Wen-hsing's *Family Catastrophe*, a classic modernist novel in Taiwan, becomes a work of faded-out modernism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esides, it seeks to explore how the English translator adopt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domestication, instead of foreignization, to reconstruct a "translation-and-transformation" copy, a "repetition in difference," which is "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

Keywords: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Wang Wen-hsing, *Family Catastrophe*, modernism

* Department of English, Shih-hsin University

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的現象，進入了文化研究層面，不再侷限於語言的轉換層面。翻譯「不再是指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其內涵已擴及「文學藝術對現實、對生活和對自然的『再現』」，擴大到了公眾（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的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接受和解釋」（謝天振 9-10）。翻譯於是被理解為一種文本建構的過程，其中蘊含了顛覆 (subversion) / 包容 (containment) ，解組 (de-composition) / 重組 (re-composition) ，解構 (disarticulation) / 重構 (rearticulation) 的力量。此外，翻譯被視為兩種文本、文化相互協商、妥協、交流、與溝通的角力場域；譯文乃是原文經過文化旅行、越界、轉移、及移植等過程後所形成的一種嶄新的「建構體」，具有新的文化意涵與主體性。

本論文以杜玲 (Susan Won Dooling) 英譯的《家變》*Family Catastrophe* 為例，闡釋王文興的作品如何經過文化翻譯，形成一部褪色的「現代主義」譯本，淡化了中文原著現代主義色彩。論文旨在析論英譯本如何透過「歸化」策略，形成一種嶄新的「建構體」。此外，論文將闡明英譯本如何展現「差異性重複」(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形成一個「看似神似卻不盡相同」(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 的相異主體」(Bahaba 86) 與「番易」(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文本。

費時七年才完稿的《家變》，自 1973 年出版以來，廣受海內外學者注目。甫出版，各方毀譽參半。對這部作品有「異」見的讀者，批評它是一部離經叛道之作，語無倫次，難以卒讀。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它是一部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實驗與創新之藝術作品。1999 年，《家變》獲文建會選為三十部「台灣文學經典」之一，被譽為台灣現代主義經典巨著。陳芳明在討論《家變》之意義時指出：「現代主義所帶來的創作技巧、審美原則與語言改造，確實使台灣文學的藝術營造有了重大轉折。沒有現代主義的衝擊，台灣作家也許還停留在五四旗幟的陰影下。也許還依賴「我

手寫我口」的白話文，也許還遵循起承轉合的傳統思維結構」(11)。由於師承歐美現代主義文學遺緒的內涵以及新批評 (New Criticism)精神，王文興對於小說語言的鍛鑄極為講究，且強調文字重於一切。他對於文字的「精省」要求，以及對於讀者的「慢讀」、「減速」要求，已臻至其所言的「橫征暴斂」(iv)之境界：

因為我有一個不近情的想法，我覺得：『家變』可以撇開別的不談，只看文字……。我相信拿開了「家變」的文字，「家變」便不復是「家變」。就好像褫除掉紅玫瑰的紅色，玫瑰便不復是玫瑰了。小說所有的零件 (components)，主題，人物，思想，肌理(texture)一概由文字表達。Period。一個作家的成功與失敗盡在文字。Period。

因為文字是作品的一切，所以徐徐跟讀文字纔算實閱讀到了作品本體。……理想的讀者應該像一個理想的古典樂聽眾，不放過每一個音符(文字)，甚至休止符(標點符號)。任何文學作品的讀者，理想的 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過二小時。作者可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比情人還橫征暴斂。(iv)

王文興對於小說文字鍛鍊與細節推敲之慎重，可以從 1978 年洪範版上述序言略窺一二。在《家變》中，王文興將現代主義所帶來的「語言改造」發揮得淋漓盡致，其特殊的文字運用與語法結構（如使用奇特的符號、夾雜文言文、運用歐化句法等）與扭曲式的實驗風格，確實令讀者耳目一新。以歐化句法為例，王文興認為，它有「阻擋快速閱讀的效果，可於閱讀上『求其慢』；同時，歐化的長句也富音樂性，可於綿長的句子中製造抑揚頓挫之效，此是中國傳統短句所不及的」（董淑玲 244）。

陳裕美在其〈試論王文興《家變》之文字〉一文中指出，《家變》中新

奇罕見之文字形式可以歸類為四種：習慣語詞的倒置、自創新詞、多用僻字，與特殊符號的運用。¹ 倘使我們以上述《家變》之特質來檢視杜玲的英譯本 *Family Catastrophe*，則不難發現中文原著所具有的現代主義痕跡（例如小說語言形式的標新、立異、獨特、激進等特質）在英譯本中顯然被淡化或忽略，因而無法達到王文興對小說文字的高度要求（例如「精省」與「慢讀」），亦無法讓熟稔歐美現代主義的英文讀者理解王文興在《家變》中是如何「陌生化」（defamiliarize）中文語言，以及如何賦予中文讀者新的視覺效果與閱讀感受。

以下討論，將以陳裕美所歸類的部分例子作為討論的出發點，透過原文與譯文之對比，闡釋英譯者如何透過「歸化」² 策略與「去陌生化」之手法，將帶有疏異感的中文語境，轉化為其所熟悉的英文語境，重新建構一個嶄新的「番易」文本。以《家變》中慣用語詞的倒置為例，杜玲的譯文顯然受制於英文句法，無法顯示《家變》「不循矩特出的語句法」（曾麗玲 163），亦無法使英文讀者減緩閱讀速度，達到精讀之效：

父親的去向續惑困著他。(6)

His father's absence continued to haunt him. (11)

例常體身均要過三天後始上浮。(10)

¹ 本論文將參照陳裕美所列舉的部分例子，對比英譯本中的譯文，並比較原文與譯文之差異。

² 借用溫努緹 (Lawrence Venuti) 在《譯者的隱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書所提出的術語：「歸化」(domestication) 與「異化」(foreignization)。簡言之，「所謂異化，就是說，譯文不僅要忠實地表達作者所說的內容，也要盡量地展現作者的表達方式，以便在譯文中最大限度地向讀者展現原在語言文化上的特色。而當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遇到某些無法逾越的、由於語言文化差異而造成的障礙時，如果採取異化法就會使譯文晦澀難懂，這時譯者就會將譯文納入目標語語言文化規範的軌道——這就是所謂的歸化……，異化要求譯文接近作者，而歸化則要求譯文接近讀者。」(阮曉霞 106-107)

It usually took three days before a body resurfaced. (14)

他並常常望希下雪。(81)

At these times, he longed for snow to fall. (76)

他發現他的父親底模樣兒竟然的遽變得那麼樣的陋醜。(216)

He would be newly struck by the sudden—so it seemed—transformation that had turned his father into this hideous-looking creature he saw before him. (227)

他是個已業退休的中央機構的質詢委員。(191)

He was a retired member of the Central Bureau of Intelligence. (202)

在英譯的「歸化」、「去陌生化」過程中，《家變》原文中「字句有誤」的倒置語詞（「惑困」、「體身」、「望希」、「陋醜」、「已業」）被轉化為拼字無誤之英文語詞（“haunt”、“body”、“longed for”、“hideous-looking”、“was”）。易言之，英文譯者無法找到英文中對等的表達方式，只能將倒置語詞還原，然後照字面意涵翻譯，於是英文譯文變得通順達意，文字上完全看不出具有實驗試煉性質的現代主義色彩。

此外，王文興在《家變》中創造新詞以達到「陌生化」之意圖，在英譯本中，亦消弭於無形：

他低頸刷牙。(9)

He lowered his head to brush his teeth. (13)

但見河驅在朝霧和朝暉交柔下面閃光緩動。(10)

Dawn and the early morning mist intermingled, shimmering on the body of water. (14)

父親自己也才久絞一把，蓋蒙他自己臉上(29)

Father placed the hot steamy towel on his face, covering it up Completely. (30)

他蝸鎮在小竹凳上。(30)

He sat hunched up like a snail on the rattan stool. (30)

他深然為自個兒的罪錯感到異常自我，咎罪地勾下了下頰。(114)

He was racked by guilt and remorse. Under their indictment he hung his head in repentance (113)

原文中新創語詞之例子（以「低頸」代替「低頭」、以「河驅」代替「河流」、以「蝸鎮」代替「蜷曲黏坐」、以「久絞」代替「搓揉擰乾」、以「勾下了下頰」代替「壓低了下頰」），在中文語彙裡皆屬非慣常語彙，其中包含了無法照字面翻譯的閩南方言（如「鎮」、「驅」、或「久絞」等字詞）。然而，英譯本中的對等語（“lowered his head”、“placed.....on his face”、“hunched up like a snail”、“hung his head”）皆是英文的慣常語彙，無法讓英文讀者在閱讀上造成停頓，進而感觸到字裡行間「陌生化」的疏異效應。

關於《家變》中所採用冷僻生字，黃裕美列舉了數例。她以「蹠」、「蹠」、「蹠」等字，說明僻字所隱含的複雜深意，例如「蹠巡」（意指「小步巡走」）優於「巡走」、「蹠坐」（「蹠」有「蹠蹠」之意，單用此字而全取詞義）勝於「跪坐」、「蹠跪」（「蹠」意指「長跪」）較單用「跪地」更能表現跪地之狀（83）：

之後便衣著睡衣睡褲在房內蹠巡。(9)

And after that, still in his pajamas, he went puttering about the house, making the rounds. (13)

他出門衣著已穿畢，但未出發，蹠坐在紗門處。(10)

He was now dressed, but he wasn't ready to go, not yet. Instead he planted himself by the screen door. (14)

只見黑壓壓的人群包圍之中于空地上蹠跪的有一個人。(192)

He went over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of the empty

space created by the crowd of onlookers was a man on his knees.

(203)

英譯本中，杜玲以慣常使用的語詞“puttering.....making the rounds”、“planted himself”、“on his knees”來翻譯「蹣跚」、「蹣坐」、「蹣跪」等艱澀語詞。英譯者採「歸化」策略，避開了「蹣」、「蹣」、「蹣」等中文僻字之翻譯。譯文不見冷僻的英文對等語詞，係屬「去陌生化」語言，讀者一目了然，毋須費時揣度字義。

《家變》中新奇罕見之文字形式亦可見諸於特殊符號的運用，例如在文字上加注符號、加粗體字，加邊線、加匡線、自創新字，用注音符號、英文字母標音、簡體字等（陳裕美 83）。茲舉數例：

他還不能全然的肯定父親真的已失了蹤。(B)

But no, he still couldn't b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Father had truly disappeared. (p. 18)

為什麼，是不是她 死 了？ (152)

Was she dead? He dashed out and burst into their bedroom. (155)

我看你變了一個人了！ (145)

You look to me like a different person altogether! (148)

他走進入以前他猶聽到他的父親被留在最後頭的一呻：「Hi ~ ~ 」 (186)

Before he got there he heard his father let out a long Sigh:

“Aigh.....” (196)

杜玲的譯文（“absolutely certain”、“dead”、“like a different.....”、“Aigh.....”）無法表現原文中透過特殊符號所欲凸顯的字義強度。「全然的肯定」中的畫線與 死 字中的匡線，這二個加強字義的視覺符號，經過

文化越界的「番易」，原文所欲凸顯的字義強度已蕩然無存。此外，中文簡體字「变」的使用，以及具有象形功能的中文延長符號（「Hi ~ ~」中的「~ ~」）之運用，旨在破除讀者的閱讀成規，使其感受到現代主義在文字上求新、求變的前衛實驗精神，然而英文譯文的對等語（“like a different.....”）與（“Aigh.....”）皆是「去陌生化」的慣常語彙，既無法讓讀者感受到少數簡體字（如「变」）在繁體中文句子中所造成的視覺顯目效果，亦無法體會中文延長符號（如「~ ~」）「不但是語氣的延長，更有所嘆之氣於空氣中飄盪之象形作用」（陳裕美 85）。

《家變》的法文譯本譯者瑪恂德(Sandrine Marchand)，在〈翻譯王文興小說的原因〉一文中指出：「一個語言裡總是有很多語言混合在裡面。現代主義的一個原則是反映語言的繁多等級、豐富變化。」(135)。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杜玲的英文譯本顯然無法將《家變》中語言揉雜多樣、繁複多變的現代主義特質呈現出來，且原文中新奇罕見之文字形式在譯者的「歸化」過程中，「陌生化」盡除，譯文於是變得不那麼晦澀難懂。據此而論，杜玲的英文譯本可謂「一個經過重組、可資變識的『他者』(Other)——一個看似神似卻不盡相同」(Bhabha 86)的「番易」文本。杜玲的譯文彰顯了「再現」理論所強調的「差異性重複」與「同中存異」之現象：再現即是一種不完備、卻具創意的模擬與「近似」(approximation)。杜玲的英文譯本與王文興中文原著的關係，借用班雅民(Walter Benjamin)的話，就好像數學上一條切線與圓的關係，交會於一點後便「沿著自己的軌跡前進，通向無限(infinity)」(Benjamin 80)，不受拘束。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英譯者杜玲透過「歸化」策略，創造了一種既能產生「去陌生化」又能達到重新建構(reconstruction)的「番易」文本，淡化了《家變》原著所欲彰顯現代主義色彩——特殊的文字運用與語法結構，以及扭曲式的實驗風格。

現代主義的精神即是對傳統價值、人類文明的懷疑和反叛。張錯指出，「現代主義抗拒傳統的基調是反寫實，而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保持一分自我清醒，有點像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史詩劇場 (Epic Theater) 所強調的『疏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173)。王文興《家變》，就語言技巧而言，師承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表現方式，求新求變，藉「精省」之文字與減速之「慢讀」，強迫讀者「保持一分自我清醒」，用心體會創作者的「陌生化」語言，進而達到「疏離效果」。

杜玲的英文譯本，採用了「歸化」策略，而非「異化」策略，無法展現中文創作者的表達方式，同時也無法呈現語言文化上的特色。筆者認為適度使用「異化」策略，可以凸顯王文興的文字創新與實驗風格，英文讀者也會較容易體會為何《家變》在台灣文學史上是一部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並瞭解此作品的時代意義。在翻譯過程中，翻譯者當然有權選擇「歸化」或「異化」策略，然而就《家變》這部作品而言，若完全捨「異化」策略，則英文讀者根本無法體會作者在創作時所欲彰顯的現代主義文字風格、「字」變與「家」變之微妙關聯、「形式」之變與「內容」之變的緊密關係。

參考書目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 Wang, Wen-hsing. *Family Catastrophe*. Trans. Susan Wan Doll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王文興。《家變》。台北：洪範，2003。新版四印。
- 阮曉霞。〈淺析英漢翻譯中的異化與歸化法〉。《桂林航太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45（2007年第1期）：106-108。
- 瑪恂德 (Sandrine Marchand)。〈翻譯王文興小說的原因〉。《中外文學》第30卷第6期，2001年11月：135-137。
- 張錯。《西洋文學術語與手冊：文學詮釋舉隅》。台北：書林，2005。
- 陳芳明。〈《秋葉》與《家變》的意義〉。《文訊》第292期，2010年2月：91-92。
- 陳裕美。〈試論王文興《家變》之文字〉。《文學前瞻》第3期，2002年6月：77-89。
- 曾麗玲。〈現代性的空白—《家變》、《背海的人》前後上下之間〉。《中外文學》第30卷第6期，2001年11月：161-172。
- 董淑玲。《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小說觀念之形成與實踐》。高雄師範大

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謝天振。〈序二〉。《翻譯的政治：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費小平著。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7-16。

對日華語教學法的一個新的提示—— 「軟誘導方式」與「翻譯訓練法」在教學上的應用

古川典代*

摘 要

隨著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裡選修漢語學習者的猛增，從事教學工作的人也應該掌握適合學生需求的教學方式。同時，不滿足過去的教學方法，自主地檢驗自己的教學方式，以提高教學質量已成為當務之急。我曾在 2005 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八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上發表了《日本大學漢語教學的前景》。其中重點介紹過「軟誘導方式教學」在教學上的有效應用方法。去年在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召開的《2008 口筆譯國際研討會》上，作為專題演講我又介紹過《「翻譯訓練法」在教學上的應用》。我在日本的課堂上一直以「軟誘導方式」和「翻譯訓練法」為車之兩輪進行十多年的華語教學工作。在此重新總結一下該教學法的應用情況，同時要提示充分利用大眾流行文化而適應當代學生需求的教學法。

關鍵詞：軟誘導方式、翻譯訓練法、學習動機

* 日本神戶松蔭女子學院大學

A new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hinese learners in Japan: Combines the “soft approaches” and the “interpreter-training method” as its two components

Michiyo Furukawa*

Abstract

Given the rapid increase now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Japan, those of us who are engaged in education are faced with the necessity to have a firmer grip o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that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learn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we should voluntarily examine our own teaching methods and not be complacent with the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In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ymposium held in Beijing in 2005, I proposed “Soft Approaches to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at the 200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held in Gaoxiong last year, where I was invited speaker, I introduced an “interpreter-training method” as applied 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e should be able to develop a number of different teaching techniques from the soft approaches and the interpreter-training method that suit the learners’ language needs and level and stimulate their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In this paper, I propose a new teaching method that combines the “soft approaches” and the “interpreter-training method” as its two components.

Key words: soft approaches, interpreter-training method, incentive for learning

* Kobe Shoin Women’s University, Japan

前言

隨著在日本大學裡選修華語的學生人數急劇增長，探求適合學生需求的教學方式已成為我們華語教師的一大課題。近幾年來，日本的高校華語教學可以說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學生群：一群是佔絕大多數的二外華語的學生。他們對華語、對中國一般都沒有多少興趣，學習動機也比較薄弱；另外一群是學習專業華語的學生。雖然人數不多，但是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學習目標都很高。

面對這些現實，在此闡述如下兩點：

- (1)「軟誘導方式的教學」能促進教材的多樣化，它對二外華語教學有吸引力。
- (2)「翻譯訓練法的應用」能促使教學方式的多樣化，它在專業華語教學上具有有效作用。

1. 二外華語學生和「軟誘導方式」教學法

1.1 「軟誘導方式」華語教學法的緣起

學生不僅對華語本身感興趣，而且還對現代中國的文化習俗特別敏感。比如說，風靡一世的 F4 及他們主演的「流星花園」就是近幾年他們的主要話題。可是在課堂裡使用的課本裡根本沒法找到最近的熱門話題，只能學到原來的以語法為主的硬梆梆的華語知識。華語教師當然不能忽視華語發音、語法等最基本的教學項目，但是筆者在此要主張教學主體在於學習者的身上。他們對 F4 或對飛輪海感興趣，那麼教師也可以利用此動機來提供相應的教學材料，寓教於樂，以便使學生培養對中華圈大眾流行文化的知識和了解。「軟誘導方式教學」所意圖的是一種教材的多樣化。

1.2 「軟誘導方式」華語教學法的定義

本文基於語言策略教學法的觀點，探討使用華語歌曲、電影以及電視節目等「軟誘導方式」(soft approach)作為華語習得媒介的教學法。我們在水平不同的各種高等學校裡任教華語過程中，發現有不少學生根本不努力學習華語，只想平平安安地拿到了學分能夠畢業就好，結果學到的東西不久就忘得一乾二淨。我們了解該情況後，經過對學生的問卷調查，發現他們愛趕時髦，就是不愛學中國歷史也想看一部電影《赤壁》。為此，筆者近幾年以來以電影、電視劇裡的對白、中國流行音樂及民歌的歌詞等平易近人的素材為輔助教材，進行軟誘導方式的華語教學法。同時對其背景加以解釋，如：介紹電影《霸王別姬》時要談到三國演義和京劇等；介紹歌曲《何日君再來》時要說明唐詩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等；介紹台灣電視劇《流星花園》時要解說F4 和日本歌手平井堅的關係、原作是神尾葉子的卡通《花不如男子》¹等，由此引導學生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並讓他們積極地學習華語。

1.3 有關課堂設計的問卷調查及其分析

筆者曾在開學第一次上課時，讓學生填寫問卷調查，問過一下幾項內容：

- 1 · 選修華語的理由
- 2 · 對教師授課的內容及方式有什麼要求
- 3 · 一節課 90 分鐘的時間怎麼樣
- 4 · 對華語教師有什麼要求
- 5 · 每週一節(=90 分鐘)，學一年華語後要達到怎樣水平

¹ 台灣電視劇《流星花園》原作卡通《花不如男子》是在 1992 年至 2004 年由神尾葉子連載集英社漫畫本《Marguerite》上。後來，1995 年日本東映把它拍成一部電影。2001 年在台灣拍成電視劇以後亞洲各國都轟動起來了。2005 年及 2007 年又在日本編輯成電視連續劇。2008 年在日本又拍了最後一部電影叫《花不如男子 Final》。2009 年在韓國開始播放自己編寫的《花不如男子》電視劇。

6. 關於中國你現在知道些什麼事情？比如，對中國的印象、想念、願望等等，請填寫具體內容

調查對象是在日本作為第二外語學華語的日本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答卷 260 份(2 所大學 7 個班)，被調查的都是日本學生。²

通過如上的問卷調查，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如下幾點：

- (1) 一半以上的學生對中國的各方面有興趣，比如：旅行、歌曲、電影、電視劇、語言、歷史以及文化等。
- (2) 差不多有一半的學生認為學習華語算是一種“趕時髦”。
- (3) 有一部分人，不想學習其他外語而選擇華語，他們以為是學華語容易拿到學分而選擇。
- (4) 學生幾乎都不願意上嚴格的課，而要輕鬆愉快地學華語。
- (5) 接近一半的學生感到 90 分鐘一節課的時間太長。
- (6) 大部分學生要求華語老師上讓人不感到厭倦的課，希望能上易懂的課。
- (7) 一半以上的學生願意學課本以外的東西，如歌曲、電影、電視節目及相聲等。
- (8) 學習一年華語後，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希望能用華語進行簡單的會話，還有不少人希望進一步去學習旅行會話等。
- (9) 學習華語之前，很多學生關於中國知道的事情並不多，了解得不夠全面。
- (10) 選修外語時，學習動機一般不強，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親戚朋友的勸告、能否跟老師合得來等。

² 學生問卷調查的具體數字請看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集》第 67-68 頁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上面所述的各點。從(1)和(2)我們可以知道，大部分日本人對鄰邦中國有友好的想法。因為最近中國國家建設、經濟發展、工業加工、科學技術、甚至 IT 及高科技領域都很突出，日益受到世界的矚目。日本社會越來越重視中國，不僅社會輿論、媒體媒介等對中國的介紹逐漸增多，而且學習華語也成為時髦。

情況(3)告訴我們，以華語為第二外語的學習者共有的特點。這就是說，因為華語使用日本人所熟悉的「漢字」，容易給人一種親近感。

情況(4)、(6)告訴我們，現代的年輕人從小就受家長呵護，沒有經歷過太多的困難，所以學習方面也不願吃苦。尤其是大學一年級學生還不到成人年齡，精神面還不夠成熟，有希望一蹴而就、急於求成的傾向。與過去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所描寫的時代完全不同，都不願接受嚴厲的指導。

如情況(5)有這樣意見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學生從小學到高中畢業一直每一節課就是 45 分到 50 分鐘。剛進大學時，還都不太習慣上 90 分鐘的大課，忍耐力不夠，集中不起精神來。

情況(7)是因為一般來講現代青年好奇心很強，對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感興趣，並且大家都有因特網等容易收集信息的工具和手段。

關於情況(8)，我們應該說日本和中國歷來是一衣帶水的鄰邦，除了商貿交流以外，去中國旅遊的人也不少。從 2003 年 9 月開始，日本人去中國旅遊兩個星期以內可以免簽，去中國旅遊越來越容易。因此，學生要求學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

有情況(9)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他們到高中階段為止對中國的知識了解得太少，特別是有關近現代歷史方面的知識了解得很不夠。如孫中山、鄧小平、周恩來、甚至毛澤東等歷史偉人的名字，很多學生都不知道。關於中國文學，不用說當代作家史鐵生、賈平凹、王朔，連巴金、老舍、魯迅

等著名作家也不知道。這跟許多中國人知道日本村上春樹的情況比起來也特別可怕的現象。再有，很多學生都不知道普通話和地方語言(如閩南話)之間的不同，更不了解各個地區以及各個民族的生活習慣。

關於情況(10)，我們可以說，一個小小的原因往往會成為學習華語的契機。有不少人因為看到了中國電影《英雄》開始對李連杰、對武功產生興趣。再如，自己的爸爸常出差去中國，就會勸孩子們學華語。還有，第一堂課上學生對老師的印象如何，也會直接影響到是否選修華語課。

1.4 「軟誘導方式」華語教學法的功能

我們認為華語教學的良性循環有如下的過程：

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動機的多樣化→根據學習者的需求選擇教學材料→培養學生對中國及華語產生興趣→使學生努力學習華語→讓學生鞏固華語基礎→促使學生熱情地學習華語→使學生華語水平「更上一層樓」

我們基於語言策略教學法的觀點，探討「軟誘導方式」(soft approach)：使用華語的流行歌曲、電影及電視節目等作為華語習得媒介的教學法。我們對學生如上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他們都愛趕時髦，就是不愛學中國歷史也想看一部電影《赤壁》。為此，我們最近以電影、電視劇裡的對白、中國流行音樂及民歌的歌詞等平易近人的素材為輔助教材，進行「軟誘導方式」的教學，教學效果都比較好。

與此同時，我們還對其背景加以解釋，比如介紹電影《霸王別姬》時要談到楚漢相爭的故事，同時介紹京劇等古典戲曲；介紹歌曲《何日君再來》時，我們要介紹唐朝詩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等典故；介紹台灣電視劇《流星花園》時，我們還要解釋說 F4 唱的主題曲《流星雨》是日本歌手平井堅的《Gaining Through Losing》的翻唱曲，以及該劇原作是日本卡通神尾葉子的《花不如男子》等，這樣我們也可以引導學生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可以給他們學習華語的很好的機會。

1.5 「軟誘導方式」教學法的難點

當然「軟誘導方式」教學法也有一定的局限，其中最大的難關是要解決知識產權的問題，其二是語言教材的加工問題。向高級水平的學生提示這些素材問題不大，可是向初學階段的學生提示這些活材料的時，應該選擇恰當的素材並要做加工、編寫等輔助性工作。可是，利用這些活生生的材料來上課，我們深感能夠使課堂氣氛變得非常活躍，學生們也一定不辜負教師的熱情。

使用這些教材時需要注意知識產權問題。目前對課堂上教學材料的非營利目的的使用一般是從寬處理。但在公共場所，比如在某一個禮堂演講時必須提前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目前各位華語老師都以自己的手法來編寫輔助性教材，可是考慮到編寫教材所花費的時間和勞力等，效率並不高。我衷心希望將來各位老師把自己編寫的教材登載到某一個網頁上，讓老師們互相借鑒，以便縮短編寫教材的時間。

1.6 「軟誘導方式」教學法已在英語教學裡有豐富的經驗

另外，我們要注意英語教學領域裡早已有所謂「軟誘導方式英語教學法」。比如在日本，已有如下不少諸如此類的大學一年級的英語課本：

Kim R Kanel 《Enjoy Pop songs》 SEIBIDO，1997

Kim R Kanel 《Hit song Listening》 SEIBIDO，1999

Teruhiko Kadoyama & Simin Capper 《English with Hit Songs》 SEIBIDO，2002

Lola G Moriguchi & Kazumi Kimura 《ALIVE JIVES Studying English with the Hottest Hits》 NAN'UNDO，2002

Teruhiko Kadoyama & Simin Capper 《English with Hit Songs—Featuring the

‘MAX BEST’CD Compilation—Revised Edition》 SEIBIDO，2006

還有不少利用電影台詞學英語的課本：

Kumiko Kamiya & Kim R Kanel 《Notting Hill》 SHOHAKUSHA，2007

Reiko Akiyoshi 《American Business Scenes in Movies》 KINSEIDO，2007

有意思的是這些課本都作為主要課本被採用在課堂裡，而不是被視為輔助教材。因此，我認為隨著華語學習者的增加，華語課文的內容也將會細化。在此，我們也不妨借鑒對日英語教學的先進經驗。

1.7 「軟誘導方式」華語教學法的實踐

下面我想簡單的介紹一下「軟誘導方式」華語教學法的實踐例子。
利用台灣電視劇《流星花園》摘錄，邊看電視邊學台詞。如：

(A)

①豬頭四，我告訴你。

Zhūtóusì, wǒ gàosu nǐ .

②不要以為我怕你們。

Búyào yǐwéi wǒ pà nǐmen .

③現在換我向你們正式宣戰。

Xiànzài huàn wǒ xiàng nǐmen zhèngshì xuānzhàn.

④第一次有人敢跟我們挑戰哎。

Dì yīcì yǒurén gǎn gēn wǒmen tiǎozhàn āi.

⑤她寫什麼？

Tā xiě shénme?

⑥這麼丑。

Zhème chǒu.

⑦不會吧？

Búhuì ba?

⑧杉菜，你真的那樣做啊？

Shāncài , nǐ zhēn de nà yàng zuò a?

⑨沒錯。我就不相信會輸給他們。

Méicuò. Wǒ jiù bù xiāngxìn huì shū gěi tāmen.

⑩真好。我認識的杉菜又回來了。

Zhēn hǎo. Wǒ rènshi de Shāncài yòu huílaile.

⑪那個勇敢又富正義感的個性才像你嘛。

Nà ge yǒnggǎn yòu fù zhèngyìgǎn de gèxìng cái xiàng nǐ ma.

⑫你一定要把他們整你的，用十倍討回來，讓他們後悔。

Nǐ yí dìng yào bǎ tāmen zhěng nǐ de , yòng shí bèi tǎo huí lái , ràng tāmen hòuhuí.

⑬我一定讓他們後悔一輩子的。

Wǒ yí dìng ràng tāmen hòuhuí yí bèi zi de.

⑭杉菜，要加油！

Shāncài , yào jiāyóu!

⑮我加油！

Wǒ jiāyóu!

⑯那你的作戰計劃是什麼啊？

Nà nǐ de zuòzhàn jìhuà shì shénme a?

⑰我也不知道哎。

Wǒ yě bù zhīdao āi.

⑱那你覺得 F4 的下一步會對你做什麼？

Nà nǐ juéde F4 de xià yí bù huì duì nǐ zuò shénme?

⑭我也不知道哎。

Wǒ yě bù zhīdao āi.

(B)

- ①このタコども
- ②私が怖がると思うな
- ③これは宣戦布告よ
- ④俺達に挑戦する気だぜ
- ⑤何だこれ？
- ⑥汚い字
- ⑦ウソ？
- ⑧宣戦布告？
- ⑨あんな奴らに負けないわよ
- ⑩やっとツクシらしくなった
- ⑪正義と勇気の人ね
- ⑫奴らを懲らしめてやりなさいよ
- ⑬一生後悔させてやるわ
- ⑭ツクシ、頑張ってるね！
- ⑮頑張るわ！
- ⑯で、どんな方法で懲らしめるの？
- ⑰決めてない
- ⑱じゃ F4 は次にどんな手を？
- ⑲分からない

(C)

- ①猪頭四，我告訴你。

- ②不要以為我怕你們。
- ③現在換我向你們正式宣戰。
- ④第一次有人敢跟我們挑戰哎。
- ⑤她寫什麼？
- ⑥這麼丑。
- ⑦不會吧？
- ⑧杉菜，你真的那樣做啊？
- ⑨沒錯。我就不相信會輸給他們。
- ⑩真好。我認識的杉菜又回來了。
- ⑪那個勇敢又富正義感的個性才像你嘛。
- ⑫你一定要把他們整你的，用十倍討回來，讓他們後悔。
- ⑬我一定讓他們後悔一輩子的。
- ⑭杉菜，要加油！
- ⑮我加油！
- ⑯那你的作戰計劃是什麼啊？
- ⑰我也不知道哎。
- ⑱那你覺得 F4 的下一步會對你做什麼？
- ⑲我也不知道哎。

準備三種講義：(A)華語並記漢語拼音、(B)日譯³、(C)華語。

由於視覺的幫助，容易掌握內容。

先把電視劇片段給學生看一遍。然後發(A)講義，跟學生一起念。然後和學生一起翻成日語。接著發(B)講義，讓學生確認日譯。特別讓學生

³ 台詞華語與日譯參照在日本CS播放時的字幕

注意的是⑰和⑱，雖然兩個台詞是一樣說法，但是譯成日語的時候有兩種說法。這樣可以使學生慢慢理解日中翻譯並不是一對一的反應。再一次和學生一起念台詞後，再一次看電視劇。如果時間允許、學生十分感興趣的話，最後再發(C)，邊練習發音邊翻成日語。

這個翻譯過程中還可以解釋女主人公的名字為什麼翻成「杉菜」。她的日語名字直接用日語的話，應該是「土筆」。可是華語當中說的「土」表現的是不瀟灑，太俗的東西，不合適於女主人公的名字。於是，採用「土筆」的別名「杉菜」，若說譯成華語的話，就是「筆頭草」。這樣用台詞學習有用的會話的同時，可以言及日中語言文化的細節。

1.8 小結

二外華語的學生都有自己的專業，有的是學經濟或法律的、有的是學工業或者是福利等。有些學生不免只為了拿到學分而上課。雖然期中、期末考試之前還比較認真學習，但是平時複習、預習、作業都不做，全都在課堂上臨時解決。放了兩個月的暑假後，有的學生連「你」的念法也想不出來，這使我們灰心喪氣。可是我認為不論在什麼領域工作，將來都會有跟中國交流的機會的。

日本中央電視台(NHK)從 1967 年開始播送《中國語會話》節目，其主題曲最近幾年也大有變化了。以前採用的主題曲是革命劇《白毛女》中的《北風吹》，大概播送了接近三十年。可最近幾年採用的幾乎都是流行歌曲，如：2005 年 amin《如果》，2006 年 潘瑋柏／弦子《不得不愛》，2007 年 張韶涵《香水百合》，2008 年 F.I.R《彩色拼圖》，2009 年 周杰倫《魔術先生》。這確實是時代的潮流。

因此我還是嚴格要求學生們起碼做成兩件事：

- 第一， 要把自己的姓名準確發音、會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 第二， 學完一年的華語課，要用華語唱一首華語歌曲。

唱歌是最單純、最有效的交流工具。我要求學生掌握節奏即可，不必注意個別的聲調。因為日本人的華語發音中聲調的錯誤相當多，其次就是送氣音和不送氣音的區分。課堂上我們還利用《用華語唱歌－卡拉 OK 學華語 vol. 1~4》(古川典代編寫，ALC,2001,2002,2007,2008)給學生介紹幾首好唱的歌曲。希望將來有機會和中國人交流時，能夠發揮其作用。

2. 專業華語和「翻譯訓練法」教學

2.1 日本的職業翻譯培訓學校

日本有幾所專門培養職業翻譯的民間機構，Inter School 職業翻譯培訓學校是其中的一個，本部在大阪。我曾在 1995 年 10 月開始在 Inter School 任教，十多年的教學期間，除了大阪本校之外，還給名古屋和福岡兩個分校上了翻譯課，基礎到職業班，幾乎所有水平的班都教過。雖說是基礎班，水平都較高，一般都有一定的學習經驗，也有不少人是留學回來的。同學們之間也可以受到啟發，相互競爭、提高翻譯水平。職業班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在從事翻譯工作(口譯和筆譯)的，她們希望進一步提高水平。我本人也曾在職業班學過兩年，得到了不少收穫。每一節課有 105 分，為 1 小時 45 分的課堂設計一般必須準備用 4、5 種教材。會話、新聞報導、中翻日、日翻中、詞彙快速反應、視譯等等，其內容豐富多彩。每個班都是由日本老師和中國老師合作擔任。日本老師主要指導中翻日，中國老師主要指導日翻中。下面介紹一下該校本科班的教學內容。

2.2 Inter School 職業翻譯培訓學校

(1) 日本老師的教學任務

1,聽力訓練：使用廣播錄音等實際教材，主要進行跟述、復述、大意等練

習，同時還要學會記筆記的方法。

- 2,中翻日(口譯)：利用演講、採訪等實際錄音，把它翻成日語。除了讓學生翻成日語外，還要求學生掌握重點後歸納成簡明的日語。
- 3,中翻日(筆譯)：利用模擬原稿，學習各種素材的翻譯，同時還要求提高收集信息的辦法，比如怎樣選擇工具書、怎樣利用網路等。
- 4,詞彙集：為了強化「快速反應」(quick-response)，以時事用語為中心編制詞彙集，讓學生背下來。課堂裡，邊放錄音邊做中翻日、日翻中的瞬間翻譯。

(2) 中國老師的教學任務

- 1,日翻中(口譯)：利用演講、工場訪問、技術交流等實際錄音，把它翻成中文。同時還要進行「逐次翻譯」(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耳語翻譯」(whispering)等練習。
- 2,日翻中(筆譯)：利用模擬原稿，學習各種素材的翻譯，同時還要求提高收集信息的辦法，比如怎樣選擇工具書、怎樣利用網路等。讓學生學會對待客戶需求的辦法。
- 3,課堂討論：聽完中文錄音後，就其內容進行課堂討論。或者在課堂讓學生把提前準備好發言原稿給其他同學發表，而後對此進行討論。通過這些訓練，培養出討論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歸納能力。

此外，在課堂上，每個教師還要安排「視譯」(sight translation)、「同步翻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等練習。

2.3 大學漢語課(專業華語)

另外，筆者從 2002 年開始在大阪外國語大學(現大阪大學)擔任「中日口筆譯實習課」，對象分別為該校華語專業的三、四年級的高年級學生，

還有研究生班。每個班上除有日本學生之外，還有幾位中國學生(大陸的和臺灣的)。其實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的混合班，從習得翻譯機能的教學效果來說並不是很理想的。可在大阪外大帶有同步翻譯設備的教室只有一間，安排教師也有限，混合班是唯一的辦法。所以，上課時盡量讓中國學生多講日語，讓日本學生多講華語，同時讓學生相互啟發、刺激、挖掘和推動各自的學習動機。

為了使教學方法更加豐富多樣化，我在課堂上積極採取「翻譯訓練法」。這樣也許可以讓學生別開生面，對華語教學感到新的樂趣。其中「跟述」是一種提高聽力的同時能夠提高反應力和說講力的好方法。

3. 自「軟誘導方式教學」至「翻譯訓練法的應用」

3.1 《中國語 shadowing 入門》

後來，經過其他外語的教學法變遷的研究，尤其是歷史較長的英語教學領域的分析，發現「翻譯訓練法」可以應用在課堂教學裡。我從大阪外國語大學漢語系畢業以來已從事二十多年的翻譯工作，由此積累了一定的業務經驗。本著這些基礎把實踐引入到教學場面，在此我應用了「翻譯訓練法」—如「快速反應」(quick-response)、「時差復述」(lagging)、「跟述」(shadowing)、「復述」(reproduction)、「視譯」(sight-translation)以及「大意」(summary)等手法。結果發現對中級以上的漢語學習者有一定的效果。在英語教學研究中得知，「跟述」這一教學方式不僅能提高聽力，同時也提高口頭說講力。由此我在過去用過的翻譯訓練法上加以改進，為初級到中級學習者編寫了一本《中國語 Shadowing 入門》(DHC 出版社)，開拓了華語課本的新領域。

我所提倡的「軟誘導方式的教學」能促進教材的多樣化，而「翻譯訓

練法的應用」能促使教學方式的多樣化。

3.2 所謂「翻譯訓練法」

一般的翻譯訓練法有一下的七種：

一、快速反應(quick-response) 也叫「條件反射式」

迅速地從日語反應出華語、從華語反應出日語。培養迅速反應的同時，也有助於強化詞彙。

二、時差復述(lagging)

快速反應的發展型做法。聽完了第二個詞彙後反應出第一個詞彙，聽完了第三個詞彙後反應出第二個，這樣繼續下去。再加難度如：聽完了第三個詞彙後說出第一個，聽完了第四個以後說出第二個……。也可以用句子同樣做下去。其目的在於提高集中力和記憶力。

三、跟述(shadowing) 也叫「同步跟讀」

耳朵聽到的語音，像影子一樣邊聽邊說。其目的在於強化“聽”和“說”的功能分別運用。

四、復述(reproduction)

聽完了一段話後，要馬上再生。其目的在於提高聽力，養成造句能力，提高記憶力。

五、視譯(sight-translation)

看到的信息立刻翻成日語或漢語，儘量使譯文自然、流暢。其目標是對應原文的發展靈活地改變譯文的形式。

六、大意(summary) 也叫「歸納」(summarization)

在理解全體內容的基礎之下，歸納核心事項。其目的在於養成主要內容的掌握力。

七、筆記(note-taking) 也叫「記錄」

記錄不過是輔助記憶的方法。需要編製最容易寫出來的符號。課堂裡只

能提示最標準的寫法和比較普遍的記號、符號和表記法。以後讓學生自己開發最適合自己的寫法。

還有「劃線閱讀」(slash-reading)、「概述」(retention)等手法，但我認為上述的七種是在華語教學的課堂裡易於導入的方法。

在此順便提醒一下：雖然翻譯訓練法是世界通用的、不選擇語種，可華語名稱譯法上還沒有得到共識。比如說：台灣說的「同步口譯」，大陸稱此為「同聲傳譯」，表示“Shadowing”的華語也有「跟述」、「跟讀」、「影子練習」等幾種說法。希望以後將會統一這些專門術語。

3.3 「跟述」(shadowing)練習法

接著重點介紹其中的「跟述」(shadowing)練習法。因為這幾年日本的英語教學裡掀起了「跟述」潮。除了大學、高專等高等教育以外，高中、初中等課程裡也採用此方法。專家們早已研究分析「跟述」(shadowing)練習有助於提高聽力的同時，能夠提高會話力，甚至能提高閱讀能力。

「跟述」(shadowing)這一手法是像影子一樣，跟著聲音同步發音的做法。

譬如：

〔聲音〕 中國的環境問題與中國城市化進程速度過快密切相關，城市化導致……

〔你〕 中國的環境問題與中國城市化進程速度過快密切相關，城市化導……

這樣不停地跟著聲音、儘可能地模仿其語調、抑揚、重音和停頓，由此不知不覺得能夠提高說講能力。

3.4 適合「跟述」(shadowing)的材料

為了面對初級階段的漢語學習者，注意以下幾點來選擇教材：

- 1) 講標準國語
- 2) 沒有地方口音(教師或播音員等受過發音訓練的均可)
- 3) 內容淺顯、易於理解的話題
- 4) 少有改口、吞吞吐吐的
- 5) 速度較慢
- 6) 有發言原稿

首先用自己的母語做「跟述」(shadowing)練習，掌握了做法和發音時機後開始做外語的「跟述」(shadowing)。考慮聽力和說講力的難度，當然母語的「跟述」(shadowing)比外語容易。為此我提倡循序漸進地提高材料的難度，如：

①母語(日語)→②低速漢語(100字/分)→③中速漢語(150字/分)→④標準速度漢語(200字/分)

3.5 為得到適時的材料

<學習雜誌>

月刊雜誌《中國語journal》ALC <http://www.alc.co.jp/china/.com>

月刊雜誌《聽聽中國語》日中通信社 <http://www.long-net.com>

<廣播>

HNK 國際新聞 <http://www.nhk.or.jp/daily/chinese/>

FM cocolo(近畿 76.5MHz) <http://www.cocolo.co.jp>

九州 LoveFM76.1 (福岡 76.1MHz,北九州 82.7MHz,西福岡 82.5MHz)

<http://www.lovefm.co.jp/>

<電影、電視劇>

CCTV 大富 http://www.cctvdf.com/j/program/cctv_top.php
《漂亮媽媽》、《夜、上海》、《冬季戀曲》、《流星花園》等等

4. 「跟述」(shadowing)的效果

4.1 能提高聽力

聽取過程一般能分為「知覺」(perception)和「理解」(comprehension)兩個階段。「知覺」意味著把聲音輸入給語言處理系統的階段，「理解」就是綜理解句子的階段。知覺聲音時還包含發音、重音、抑揚、音律和停頓等口語裡含有的各種音韻，其總稱為「韻律」(prosody)。這個「韻律」就是助於理解的因素，並肩負著溝通時的核心作用。因此，理解內容之前只模仿聲音的所謂聲音處理的「跟述」時，刺激聽取前一階段的知覺和韻律，由此容易連繫到理解階段。這種手法並不是期待詞彙和語法意識的強化，而是期待著加強聲音方面的機能。集中做「跟述」練習後，在復唱力、構音力等非知識的技能領域裡有顯著的效果，能夠提高聽力技能。不用說最後到「理解」的這一階段之前，同時需要強化知識面。

聽力

知覺聲音----- (知識面=詞彙／語法／表現等) → 理解

↑

發音 · 重音 · 抑揚 · 韻律 · 停頓

(韻律 prosody=音韻因素→助於理解)

4.2 能提高說講力

「跟述」是模仿耳朵聽到的聲音而同時發音的手法。因此聽取的同時

說講其內容。翻過來說，這算練習發音。再說掌握上述的「韻律」(prosody)包含發音、重音、抑揚、音律和停頓等後，可以糾正自己的發音。發音的人，自己發音的同時監測自己說出的聲音，這就是「認知系統」(metacognitive system)中的「監測」(monitoring)作用。在「認知系統」(metacognitive system)裡，由另外一個客觀的自己來隨時監測自己的言語活動，萬一有不合適的情況，馬上加以糾正。換言之，自己的「認知系統」(metacognitive system)所謂自己監測自己認知活動能力越完備越得到高效率的語言習得。簡單地說，「跟述」過程中由另外一個我來監測自己的「跟述」是否正確地模仿聲音，不適當的時候隨時加以糾正的作用。

這樣充分發揮「認知系統」(metacognitive system)中的「監測」(monitoring)作用，踏踏實實地「跟述」後，不知不覺地掌握「韻律」(prosody)。由此能夠完備自己的聲音數據庫的同時，能夠提高說講力。通過「跟述」練習，可以期待這種良性循環。

4.3 能提高閱讀能力

近幾年的研究驗證，經過提高聽力的訓練，同時能夠提高閱讀能力。這叫「正面轉移」(plus-transfer)。正如上述那樣，專家認為「知覺」轉到「理解」階段以後，聽力和閱讀能力的技能會一體化。「跟述」時，在人的大腦中同時對詞彙、語法、意義、文理和被叫「配合」(schema)的關聯信息進行處理。這個程序跟閱讀的程序一模一樣，所以說：通過「跟述」練習，除了提高聽力以外還能提高說講能力和閱讀能力。

4.4 結論

「翻譯訓練法」從來對培訓專業翻譯使用的方法，本來適合用於高級水平的漢語學習者。但是，慎重選擇適當的教材、適當的做法後，可以用在入門和初級階段的學習者。其中「跟述」(shadowing)對學習者習得效果

特別高，因此我要提倡把「跟述」練習積極運用在學習外語的課堂設計上，由此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

結語

本文基於語言策略教學法的觀點，探討使用「翻譯訓練法」做為華語習得媒介的教學法，以便促使華語教學方法更加多樣化。目前，我在以「軟誘導方式教學法」和「翻譯訓練法」為車之兩輪進行教學工作。充分利用這兩種教學手段，提高高效率的教學機能，以滿足從初級到高級各階段的學生們的學習需求，是我的教學理想。我衷心希望能夠在提高學生華語能力的同時，我自己的教學水平也日益進步。

參考書目

- 浅野恵子、『シャドーイング&ディクテーション』、東京：DHC、2004
- 角山照彦、『映画を教材とした英語教育に関する研究』、東京：ふくろう出版、2008
- 門田修平、玉井健、『決定版英語シャドーイング』、東京：コスモピア、2004
- 柴田バネッサ清美、『実戦ゼミ・ウィスパリング同時通訳』、東京：南雲堂 2001
- 柴田バネッサ清美、『はじめてのウィスパリング同時通訳』、東京：南雲堂、2004
- 玉井健、『英語シャドーイング 映画スター編』、東京：コスモピア、2004
- 玉井健、『リスニング指導法としてのシャドーイング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5
- 玉井健、『英語シャドーイング 入門編 決定版』、東京：コスモピア、2005
- 塚本慶一、『中国語通訳への道』、東京：大修館書店、2003
- 鳥飼玖美子監修、玉井健、染谷泰正、田中深雪、鶴田知佳子、西村友美、『はじめてのシャドーイング』、東京：学研、2003
- 古川典代、『中国語で歌おう！ーカラオケで学ぶ中国語』、東京：アルク、2000
- 古川典代、『中国語で歌おう！ーまるごとテレサ・テン編』、東京：アルク、2001
- 古川典代、「ソフトアプローチの中国語教育法—歌や映画・ドラマなどを素材として」、『中国語教育第2号』、(東京：日本中国語教育学会、2004) 1-18

- 古川典代、「中上級学習者への通訳トレーニングメソッド応用とその展望」、『関西大学中国語文学会紀要第26号』（大阪：関西大学、2005）215-230
- 古川典代、「中国語シャドーイングのすすめー通訳トレーニングメソッドの初級語学教育への活用」、『大阪外国語大学言語社会学会研究報告書 vol. 7』（大阪：大阪外国語大学、2005）17-26
- 古川典代、『中国語シャドーイング入門』、東京：DHC、2005
- 古川典代、『中国語で歌おう！ー日本の心の歌編』、東京：アルク、2007
- 古川典代、『中国語で歌おう！ー決定版テレサ・テン編』、東京：アルク、2008
- 水野真木子、中村眞佐男、鍵村和子、長尾ひろみ、『グローバル時代の通訳』、東京：三修社、2002
- 水野真木子、鍵村和子、『改訂三版 通訳トレーニングコース』、大阪：大阪教育図書、2003

跟述練習應用在華語初學者上之成效： 提升日本自學者的聲韻感

関口智子*

摘 要

在日本，「跟述練習」常應用於同步口譯的訓練中，近年，其應用在英語教育上的成效也逐漸受到矚目，亦有不少研究提到跟述練習應用在外語學習時，不僅可以提昇聽力、矯正發音，更可以加強閱讀能力、提高語彙數，在加強各方面的語言能力上均展現出其效用。在日本的英語教育中，跟述練習之成效備受矚目，但在其他國家對其並不熟悉；再反觀日本國內，除英語教育外，也鮮少被實施在其他外語教育中。此外，跟述練習所帶來的成效，在英語教育上已廣泛的被研究，但應用於其他語言上的研究則少之又少。筆者認為跟述練習應用在學習其他語言時，也應能帶來同樣之學習成效，故認為有必要依語言分別來驗證跟述練習之效果。

本研究以華語作為本次學習之外國語言，並驗證跟述練習的效果。且將研究重點放在驗證學習者的聲韻上(rhythm, accent, intonation 等)。參考文獻中提到跟述練習在提升聲韻感上有相當的成效，那麼在個別音位的習得及矯正上又有何效果呢？本研究由 1)聲韻成分 2)個別音位 3)流暢度 4)理解度 四個項目來分析跟述練習的成效，實驗結果發現相對於對照組，每天持續進行跟述練習的實驗組學習者在上述四項比較項目中皆顯示出正面的成長數字。因此，本研究不僅肯定跟述練習有助於習得華語，也相信其成效亦有可能反映在聲韻以外之能力提昇上。

關鍵詞：跟述練習、口譯訓練、華語學習、聲韻

* 日本東海大學外國語教育中心

Evaluations of Shadowing Exercises for Novice Chinese Learners: Phonological Performances of Japanese Self-learners

Tomoko Sekiguchi*

Abstract

“Shadowing,” a training method originally used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has gained much popularity in the field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Japan.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hadowing ranging from improvement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articulation of speech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general. Despite its soaring popularity in English learning, shadowing seems to be little known or practiced in the field of othe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t home and abroad. In contrast to a great amount of research done regarding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shadowing on the acquisition of other languages are scarce. Although we can anticipate that shadowing would do more good than harm when learning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besides English, educational venues await further studies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shadowing in learning a particular languag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s of shadowing on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lthough shadowing is claimed to have an effect in multiple areas in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improvement in the phonological sphere, more specifically prosodic performance, which has been widely agreed upon in the literature. Previous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Tokai University, Japan

shadowing in brushing up learners' prosodic sense, such as rhythm and intonation in particular. This leads to an assumption that shadowing should be even more effective in Chinese learning as prosod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is tonal language. Is the effect of shadowing limited to prosody as claimed in previous studies, or can the effect be observed in other areas in phonology as well? To explore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shadowing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1) prosodic elements, 2) individual phonemes, 3) fluency, and 4) intelligibility.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practiced shadowing on a regular bas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all of the four phonological aspects. Also, it was confirmed that in all these are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who did not practice shadowing at all.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lend further support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shadowing in improving learners' prosodic sense, and also suggest its potential of contributing to other phonological aspects as well.

Keywords: shadowing,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rosody

1. INTRODUCTION

1.1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Japan, since the last decade, “shadowing,” a method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train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both self-study and in classroom learning. The term “shadowing,” derived from the verb “to shadow,” means following the model as closely as possible just like a “shadow.”¹ In the course of shadowing, learners repeat what they hear the speaker say; thus, they engage in two activitie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1960s, the act of shadowing was first investigated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by a Russian psychologist, Christovich. He analyzed model utterances as stimuli and the shadowed utterances as responses from a behaviorist point of view (望月, 2006). Then shadowing was introduced as one of the basic training methods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鳥飼, 2003). Shadowing was practiced by would-be interpreters as an introduction to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ers have to juggle three tasks at the same time: “listen,” “understand,” and “translate.” In this sense, shadowing was considered effective in acquiring this out-of-the-ordinary skill in daily lif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Now in Japan amid the growing desire to enhance communicative

¹ Technically, shadowing is defined by Lambert (1998) as follows: a paced, auditory tracking task which involves the immediate vocalization of auditorily presented stimuli, i.e. word-for-word repetition in the same language, parrot-style, of a message presented through headphones (cited in 本条, 2007).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shadowing has been introduced in the area of English education. Teachers a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come to practice shadowing in class in the hope of effectively develop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which are the weak points of many Japanese students.² The popularity of shadowing can be seen in the number of textbooks published each year with the word “shadowing” in their title or subtitle. There are also many distance learning and online study programs which advertise a “shadowing” method, probably intended to catch the eye of English learners.

1.2 Shadowing in learning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Despite its soaring popularity in English learning, shadowing has been used much less in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This again can be seen in the number of textbooks published for learning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with “shadowing” in their title or subtitle. Table 1 tabulates the number of textbooks for eight languages published from 2003 to 2009 in Japan.³

TABLE 1 The Number of Books with “Shadowing” in the Title or Subtitle

Language	Year							Total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English	1	4	3	1	2	4	4	19
Chinese	0	0	3	1	2	1	2	9

² Shadowing has been more recognized among Japanese teachers of English than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³ These textbooks were searched for using the keyword of “shadowing” at Amazon.co.jp.

French	0	0	0	0	0	0	0	0
German	0	0	0	0	0	0	0	0
Japanese	0	0	0	1	0	0	0	1
Korean	0	0	0	0	0	0	0	0
Russian	0	0	0	0	0	0	1	1
Spanish	0	0	0	0	0	0	0	0

As shown in the table,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extbooks for English with “shadowing” in the title or subtitle totals 19 from 2003 to 2009, while those for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are minimal. There is only one textbook available for Japanese and Russian each, and no textbook for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French, German, Korean and Spanis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phenomenal that since 2005, nine textbooks with “shadowing” in the title have been published for Chinese. Figure 1 illustrates the number of textbooks for Chinese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or Engl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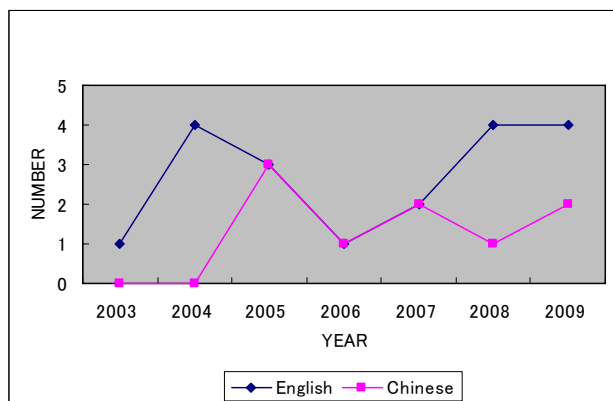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number of books with “shadowing” in the title or subtitle
(English and Chinese)

This trend observed in Chinese textbooks may signal that shadowing has begun to be recognized in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Japan.

1.3 What is shadowing?

“Shadowing” and “repeating” (in the conventional sense) are similar in that learners vocalize sounds following the given phonological stimuli,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timing of vocalization. In the case of repeating, learners vocalize during the pause given after the model, while in the case of shadowing, learners vocalize almos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model with only a split-second lag. The following illustrates the timing of vocaliz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repeating.

Repeating: (Stimuli) 你好。我 叫 李佳。
Ni hao. Wo jiao LiJia./
(Learner)Ni hao. Wo jiao LiJia.

Shadowing: (Stimuli) 你好。我 叫 李佳。請問、您 貴姓？
Ni hao. Wo jiao LiJia. Qingwen, nin guixing?
(Learner) Ni hao. Wo jiao LiJia. Qingwen, nin guixing?

The timing of vocalization is essential to shadowing. Overlapping the model with almost no time lag ensures that 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enters in the phonological loop (located in the working memory) as precisely as possible. When repeating, it is difficult to do so because the precise sound image is likely to fade away while waiting for a pause to repeat.

1.4 Effects of shadowing

In the literature, shadowing has been claimed to be effectiv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染谷, 1998; 鳥飼, 2003; 門田・玉井, 2004; 望月, 2006).

- i) improvement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 ii) improvement in articulation
- iii) acceleration of production speed
- iv) improvement of prosodic sense
- v) enhancement of concentration

Most researchers agree that shadowing ca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which in fact may not come much as a surprise. Some researchers claim that the effects of shadowing are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phonology.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studies which report some positive effects on reading proficiency (迫田・松見, 2005) and vocabulary acquisition (船山, 1998).⁴

1.5 Statement of purpose

In contrast to the great amount of research done in English,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hadowing in other languages. Shadowing may be practiced in othe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t should be effective in the same vein as it is with English. If more language-specific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methods and instructions tailored to each language could be explored.

⁴ 迫田・松見(2005, cited in 望月, 2006) reported that after introducing shadowing in class, learners of Japanese had made a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a Japanese proficiency test which had assessed vocabulary, grammatical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y concluded that shadowing facilitat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cluding semantic processing, and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ral reading in enhancing the accuracy of reading.

Against such a background,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effect of shadowing on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now in Japan learning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s elective, rather than mandatory at most universities, regrettabl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take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is on the decline. Yet, Chinese is usually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Firs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firm whether shadowing can bring a positive effect in learning Chinese, as claimed in learning English.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in phonological performances, which is less contentious among scholars. 染谷 (1998) and others claim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shadowing is effective in brushing up learners' prosodic sense. This is because shadowing requires learners to imitate the model as closely as possibl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prosodic elements such as accent, pitch, rhythm, and intonation. Some researchers, however, consider that shadowing does not have much to do with improv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individual phonemes. Thus, secondly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shadowing can also assist in improv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individual phonemes. These two issues are explored by looking into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y Japanese learners at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question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is as follows: do students who have practiced shadowing on a daily basis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experimental group) perform differently from those who have not (control group)? This question merits investigation for two reasons: 1) i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in fact, performing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t would confirm that shadowing is effective in phonological performances, not only in English but also in Chinese, lending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shadowing may have a universally beneficial effect regardless of language; 2) i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howing improvement not only in prosody, but also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individual phonemes, shadowing would prove effective in a segmental domain as well, which is smaller than the suprasegmental domain of prosody.

2. METHOD

2.1 Participants

In Fall 2008, a pilot study (Experiment 1) was conducted using volunteers taking a second year Chinese course (Experimental $n=5$, Control $n=5$).⁵ The study (Experiment 2) was replicated during Spring 2009, using different volunteers from those enrolled in an equivalent-level second year Chinese course (Experimental $n=6$, Control $n=6$).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s turned out to be small as volunteer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are asked to practice shadowing daily, are hard to obtain.

2.2 Procedures

In the two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racticed shadowing on a daily basis at home (about 20 minutes a day), using the textbook with a CD.⁶ At the onset, guidance was given to briefly explain how and why shadowing

⁵ As the author was on sabbatical leave from April 2008 to March 2009, the pilot study (Experiment 1) was conducted at the institution she belonged to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Although the two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he level of the Chinese classes and Chinese language background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considered to be roughly the same.

⁶ The same textbook was used for both Experiment 1 and 2. (古川典代, 『中国語シャドーイング入門』 [Introduction to Shadowing in Chinese] Tokyo: DHC, 2005.)

works, and instruct how to practice shadow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keep a log on a sheet prepared by the author after practicing shadowing each time, including such information as i) the chapter they worked on, ii) the length of practice (e.g. 25 mins.), and iii) any comments (self-evaluation, questions etc.). In case students could not find time to shadow for some reason,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record this fact honestly. Although 20 minutes was suggested as a guideline for daily practice, they were not restricted from practicing longer. That would allow them to catch up if they fell behind schedule. To keep the participants motivated, counseling sessions were held once every two weeks. This one-on-one meeting served as an opportunity to give them advice and assess their progress individually. During the session, their performance of shadowing or oral reading was recorded into a computer so that participants could self-evaluate their own performance, comparing it with their previous recordings.

The experiments in the present study differ in methodology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following two ways: setting and time. In this study, shadowing was practiced at home, not in a classroom, and it was done daily, not weekly as in a normal classroom setting.⁷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ments, oral reading from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recorded (pre-tes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ad given items aloud at their own pace (10 items in Experiment 1, and 15 items in Experiment 2). In Experiment 2, the number of items to be read was increased from 10 to 15, just in case part of the data

⁷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applying this method: i) as the author is an English teacher, it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for her to have them practice shadowing in a Chinese class, and ii) the effects of shadowing, if any, are to be more visible when practiced daily than weekly.

became unavailable for use due to any problems. Later 10 items out of 15 were randomly picked up for analysis. Also, based on the feedback from the raters in Experiment 1, instead of single utterances, sets of an exchange were used as an item so that rating could be more easily and accurately done. Consequently, the items used in the two experiments were not identical, but each experiment was internally consistent in terms of comparable pre- and post-test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recording was administered again for both groups (post-test). Their pre- and post- oral readings were then evaluated by three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⁸ Their performance was rated on the scale of 1 to 7, (7 is the highest) in the four categories: 1) prosodic elements, 2) individual phonemes, 3) fluency, and 4) intelligibility. This categorization was adopted from 山根・齋藤・八島 (2004) with a slight modification.⁹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on 1) prosodic elements and 2) individual phonemes.

2.3 Analysis

First, the individual means of 10 items rea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the pre- and post-tests were calculated for each of the four categories. Then, the mean scores for the two groups on the pre- and post-tests were calculated by category. These group means were then compared to see whether there were any differences i)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tests, and ii)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that is, whether shadowing caused the former to score higher than the latter. The *t*-test

⁸ The same raters (two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one from Taiwan) evaluated the recordings both in Experiment 1 and 2.

⁹ 山根・齋藤・八島 (2004) used the following four constructs in their study: prosody, segmental, articulateness, and impression.

(1-tailed) wa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differences observed, if any, were significant. Given the effectiveness of shadowing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null hypothesis of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ere adopted an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to all tests was set at $\alpha < .05$.

The null hypotheses (H_0) and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es (H_1) to be tested for this study are formulated as follows:

Analysis1: H_0 :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s for the pre- and post tests.

H_1 : The mean for the post-tes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the pre-test.

Analysis2: H_0 :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s for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H_1 : The mean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ed and critical statistics were compared, and if the observed t -value was greater than the critical t -value, the null hypothesis was rejected, and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was adopted.

3. RESULTS

Analysis1: Comparison of mean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tests

The following tables summarize the group means measured in the four categories in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Means between Pre- and Post-tests (Experiment 1)

Category	Test	Control Group (n=5)	Experimental Group (n=5)
		Mean (SD)	Mean (SD)
Prosodic Elements	Pre-test	4.0 (.5)	3.9 (.7)
	Post-test	4.2 (.5)	4.4 (.7)
	(Diff.)	.2	.5*
Individual Phonemes	Pre-test	3.9 (.6)	4.0 (.8)
	Post-test	4.3 (.6)	4.5 (.8)
	(Diff.)	.4*	.5*
Fluency	Pre-test	4.2 (.5)	4.0 (.7)
	Post-test	4.5 (.6)	4.7 (.7)
	(Diff.)	.3	.7*
Intelligibility	Pre-test	4.6 (.5)	4.6 (.8)
	Post-test	5.1 (.6)	5.2 (.8)
	(Diff.)	.5*	.6*
Mean	Pre-test	4.2	4.1
	Post-test	4.5	4.7
	(Diff.)	.3	.6*

**p<.01 *p<.05

TABLE 3 Comparison of Means between Pre- and Post-tests (Experiment 2)

Category	Test	Control Group (n=6)	Experimental Group (n=6)
		Mean (SD)	Mean (SD)
Prosodic Elements	Pre-test	4.0 (.1)	4.7 (1.1)
	Post-test	4.4 (.6)	5.2 (.8)
	(Diff.)	.4	.5*
Individual Phonemes	Pre-test	3.7 (.3)	4.5 (1.0)
	Post-test	3.8 (.4)	5.0 (.8)
	(Diff.)	.1	.5**
Fluency	Pre-test	3.9 (.4)	4.8 (1.0)
	Post-test	4.3 (.7)	5.4 (.7)
	(Diff.)	.4*	.6**
Intelligibility	Pre-test	4.4 (.4)	5.3 (1.1)
	Post-test	4.7 (.6)	5.8 (.7)
	(Diff.)	.3	.5*
Mean	Pre-test	4.0	4.8
	Post-test	4.3	5.3
	(Diff.)	.3	.5*

**p<.01 *p<.05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 Table 2 and 3 indicate that, in the two experiments, in all four categories there was a consiste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scores of the pre- and post-tests administer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se differences are all significant at well below the 0.05 probability level set for this study. The probability, then, is less than 5% that these differences occurred by chance alone. Thus, the null hypothesis of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s is rejecte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though the control group also shows improvement in the mean score in all the categories,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cept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individual phonemes and intelligibility in Experiment 1, and fluency in Experiment 2). In particular, in Experiment 2, two asterisks ** at the category of individual phonemes and fluency indicate that there is only a 1 percent chance that observed differences would occur by chance alone.

Analysis 2: Comparison of mean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the means of the post-test of the two groups measured in the four categories in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TABLE 4 Comparison of Means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Category	Group	Experiment 1	Experiment 2
		(N=10)	(N=12)
		Mean (SD)	Mean (SD)
Prosodic Elements	Experimental	4.4 (.7)	5.2 (.7)
	Control	4.2 (.6)	4.4 (.5)
	(Diff.)	.2	.8*
Individual Phonemes	Experimental	4.5 (.8)	5.0 (.8)
	Control	4.3 (.6)	3.8 (.4)
	(Diff.)	.2	1.2**
Fluency	Experimental	4.7 (.7)	5.4 (.7)
	Control	4.5 (.6)	4.3 (.7)
	(Diff.)	.2	1.1*
Intelligibility	Experimental	5.2 (.8)	5.8 (.7)
	Control	5.1 (.6)	4.7 (.6)
	(Diff.)	.1	1.1**
Mean	Experimental	4.7	5.3
	Control	4.5	4.3
	(Diff.)	.2	1.0*

**p<.01 *p<.05

Overall, the mea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Experiment 2 are larger than those in Experiment 1 across all the categories. On average, the mean difference of the four categories in Experiment 2 is 1.0 in contrast to 0.2 in Experiment 1. More specifically in Experiment 2, the mean differences of the two groups in all the four categori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at is, the 0.8 point difference in prosodic elements, and the 1.1 point difference in flu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robably did not occur by chance alone ($\alpha < .05$); also the 1.2 point difference in individual phonemes, and the 1.0 point difference in intelligi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robably did not occur by chance alone ($\alpha < .01$). In Experiment 1, however, across all the categori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mea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4. DISCUSSION

As shown i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learly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s. First,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overall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s, which gives support to the claim that shadowing is effective in the phonological sphere, not only in English but also in Chinese. Although the control groups showed progress in the post-test, the difference is not necessarily significant enough. Second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showed improvement beyond the scope of prosody,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common belief that shadowing has a limited effect, that is, only enhancing learners' prosodic sense. In light of this, it deserves attention that shadowing has a real chance to b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learners' phonemic sense as well. If this is the case, shadowing might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phonemes Japa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have

difficulty with, such as the distinction of /r/ and /l/, /s/ and /θ/, /æ/ and /ʌ/, and so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s more salient in Experiment 2 than in Experiment 1, which may result from some adjustments made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As touched upon earlier, in Experiment 2, the items used in the pre- and post-tests were sets of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not single utterances.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put emotion in reading a set of exchanges, which would certainly affect the rhythm, intonation and other phonological aspe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xperiments could also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 in motivation of the learners. It turned out that the participants for Experiment 1 were all repeaters students, seemingly with les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hinese, while those for Experiment 2 were highly motivated with a clear objective of studying abroad, for example. In this contex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Experiment 2 showed progress in a much shorter period of time.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in Experiment 2,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tests was actually five to six weeks, while it was 11 to 12 weeks in Experiment 1. This finding accidentally bears out the claim by 玉井 (2005) that shadowing can have an immediate effect and work even in a short span of time.

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lend support for the claim that shadowing may have a universal effect regardless of languages to be learned.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at the same results are obtained by replicating this study across other languag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specifically in which domain shadowing can prove effective in each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 If any variation among languages is discovered, a language-specific approach or method would be neede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shadowing.

In the current study, as it turned out, the two sets of experiments involved different learning motives and goals. The motivational factor would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hadowing exercises. Studies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must often address issue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multiple variables. A foreseeable extension of this research would be to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that ma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shadowing: i) the period of practice (e.g. 1, 3, 6 months, a year, or more), ii)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daily (e.g. 20, 30 minutes, an hour, or more), iii) level of proficiency (e.g. beginner, intermediate, advanced), iv) motivation of learners, and other variables. As to i) and ii), there is no study investigating exactly how long and how often shadowing should be practiced to have any effect.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proficiency of learners relates to the effect of shadowing is still open. Although there is a study by 玉井 (2005) which shows that shadowing is more effective at the beginner level rather tha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or above, it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see whether shadowing would bring different effects to different levels. Findings on these issues would afford some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hadowing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general.

Works Cited

- 門田修平・玉井健、『英語シャドーイング』、(東京：コスモピア、2004)
- 迫田久美子・松見法男、「日本語指導におけるシャドーイングの基礎的研究(2)」、『2005年度日本語教育学会秋季大会予稿集』、(日本語教育学会、2005)
- 染谷泰正、「プロソディーセンス強化訓練の効果に関するアクションリサーチ」、『通訳理論研究第7巻2号』、(日本通訳学会、1998) 4-21
- 玉井健、『シャドーイング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5)
- 鳥飼玖美子他、『はじめてのシャドーイング』、(東京：研究社、2003)
- 船山仲他、「語彙獲得におけるシャドーイングの貢献度」、『シャドーイングの応用研究』、(日本時事英語学会、1998) 17-28
- 本条勝彦、“Many Shadowings’ Model.” handout at the 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JAIS (日本通訳学会、2007)
- 望月通子、「シャドーイング法の日本語教育への応用を探る」、2006.
Web. 22 December, 2007.
- 山根繁・齋藤栄二・八島智子、「リピーティングが英語プロソディーの習得に与える効果」、『ことばの科学研究第5号』(ことばの科学会、2004) 45-51

動物商標的文化翻譯

劉慶秋*

摘 要

在我國的出口產品中，有很多商品是以動物作為商標的。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英兩種語言以各自特定的文化內涵賦予同一種動物辭彙以不同的寓意，給人們帶來截然不同聯想。充分認識這種文化差異有助於我國的對外交流，以及有效地進行翻譯。

關鍵詞：商標、動物、翻譯、跨文化交際

*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系

The Translations of Animal Trademarks Across-cultures

Liu, Qingqiu*

Abstract

Many animals are used as trademarks of the exported goods in our countr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for the same kind of animal Chinese and English give the animal words different allusion resp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will bring people different associ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will help the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ers for our country.

Keywords: trademark, animal, 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Translation Departmen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1. 引 論

商標是識別商品的標記，商標用語是當今經濟大潮中發展變化最快、最突出的社會用語，它通過各種管道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作為「未見其物先聞其名」的商標，其作用非同小可，取名得當產品會風靡全球，反之，則會使之一蹶不振。動物商標的翻譯作為直接為經濟服務的一種手段，其文化意義確實值得認真深入研究。

文化是一個蘊含豐富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長期以來一直不甚明確。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 Taylor)曾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說：「文化是一種複雜的總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美國傳播學教授薩默爾在其新著《跨文化交際》(*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中對文化作了比較全面的定義：文化是一群通過個人或者群體世代努力所獲得一切沉積物，包括知識、經驗、信仰、價值觀、行為、態度、意義、等級制度、宗教、時間概念、角度、空間關係、宇宙觀以及造物等。世界上每一種文化既有共性更有個性，都有其他文化不具備的特質，而且每一種文化都是平等共存的，不能相互取代。語言不僅是思維和交際的工具，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反映，並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由於每種文化的個性大於共性，這種文化間的差異反映到承載文化的語言上，就勢必造成影響跨文化交際的障礙。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E. Sapir)在《語言論》中曾經提出：「文化這名稱的定義是一個社會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麼。」美國行銷學家菲利浦·凱特拉奧把文化描述為：「文化影響、造就和支配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它是人們對生活的全面設計。」因此，在對商標進行翻譯時，需要研究語言、文化、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和審美價值的差異。

商品的商標，雖然看起來只有短短的幾個字，但它的翻譯決不是將

一種語言文字轉化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的機械翻譯活動，而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中外文化的差異性，要求商標的翻譯必須研究不同國家文化的內涵，適當考慮文化因素，既要考慮到本國的特色，又要考慮到符合國外顧客的心理，以便更有效、更確切地表達出該商品的內在含義。好的商標翻譯，既體現了各自文化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也反映了各自國家和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文化心理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衍變過程中由民族文化積澱而成的心理特徵。由於東西方地域環境，種族淵源，歷史變革、宗教信仰、經濟發展、政治制度等諸方面的原因，各國人們心理特徵也必然不同，從而產生千姿百態的價值觀念、語言聯想和消費心理。由於中華民族和英語民族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風俗習慣、風土人情、文化傳統等，商標的翻譯就必須準確的找到這種差異，才能在翻譯工作做到文化資訊對等，從而達到較好的效果。

商標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符號，是商品的標記，通常用特定圖形、文字或符號以供識別。它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商標的特點包括有獨斷性、指示性及聯想性等。獨斷性對於企業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企業的商標沒有了獨斷性，企業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本。

聯想性是大多數商品商標的一個共性，能夠起到吸引消費者的作用。例如，中國雅戈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把「雅戈爾」翻譯為“**Youngor**”，是英文單詞“**younger**”的諧音，意為該公司的服裝會使顧客更加年輕，充滿活力，從而使顧客產生購買欲。

我國很多出口商標以飛禽走獸、花鳥魚蟲來命名。翻譯時，譯者一定要事先瞭解商品是銷往哪一個國家或地區，以便搞清楚哪些動物在國外受歡迎，哪些又是應避諱的。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存在許多這樣或那樣的忌諱，對於那些千百年來形成的忌諱我們要盡可能的避免。動物商標的翻譯要充分考慮語言與文化的差異。一種文化的中的吉祥物可能是另

一種文化中的禁忌。為了避開這種禁忌，在翻譯動物商標時，譯者可以採用多種不同的翻譯方法。可以是文字翻譯，也可以是文化翻譯，還可以採用諧音翻譯或者是部分音譯部分意譯等多種不同的翻譯方法。總之，動物商標的翻譯要符合進口國的文化背景，做到音、形、意的完美統一。本文從幾個方面對動物商標的翻譯進行了分析，使得譯者能用詞得體，準確表達原商標的文化內涵。

2. 語言與文化差異在動物商標中的體現

商品總是與其企業創始人、產地相關，不同地域賦予商品不同的文化內涵。作為商品標記的商標，自然也具有該商品所承載的人文地域文化特徵。一種商標反映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英語中的“Goldlion”牌領帶，“Crocodile”牌皮具。從目的論角度來看，商家喜歡用動物名稱命名商標，是試圖通過人們腦海中已有的對動物某種特性的聯想，來提示消費者商品具有某種特性。如在西方文化中 lion 是勇敢、威嚴的象徵，常用來指代在社交場合的寵兒、名人。以 Goldlion 命名領帶，讓人聯想到繫上這種領帶便會身價大增、身份顯赫。再如 crocodile 皮珍貴，具有良好的耐磨性，以 Croc-odile 命名的皮具可以讓人聯想到該皮具的優良品質。然而由於文化淵源不同，詞語承載的文化涵義也必然不同，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氛圍中所引起的語義聯想也不相同，日常生活中借物喻義，觸景生情，是常見的語言現象，也是各民族共同的思維方式。但由於不同民族對事物的偏愛不同，在商標命名方面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反應。例如：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鳳凰」是一種想像中的吉祥鳥，許多出口商品的商標或圖案喜歡用鳳凰作標記。上海名牌產品「鳳凰牌」自行車的商標直譯為 Phoenix，在漢文化中鳳凰給人以「吉祥、如意、高貴」的聯想。在古代，

人們相信鳳凰出現預示著天下太平，將鳳凰比作皇后。而在西方文化中 **Phoenix** 則意蘊著「再生」、「復活」，以此為商標勢必使人產生「死裏逃生」、「死而復生」的不良聯想。

商標翻譯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一些政治經濟等方面有特殊含義的詞語，政治制度不同也會引起語用失誤。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也為了更好地促進各國人民的友誼，譯者一定不能忽略可能和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有關的商標的翻譯。英漢民族的社會制度不同，一些反映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詞語對不熟悉中國國情的英語民族也造成資訊傳遞障礙，是引發動物商標翻譯語用失誤的不可忽視的原因。動物商標命名應盡量避免使用政治上有特別含義、易引起誤解的商品名稱。如：「白熊」商標譯為 **Polar Bear**，也易造成誤解。白熊生長在北極圈地區，從翻譯角度看，英文名稱的確是 **Polar Bear**，但當今國際政治語言中 **Polar Bear** 另有特殊含義；它的意思是俄羅斯，**Polar Bear** 是食肉動物，這裏將它比作超級大國。為避免誤會可改譯為 **White Bear**。

人們普遍認為，離開語言，就不能理解一種文化；同樣，離開文化，也不可能理解一種語言。因為語言本身是人類進行創造和交流的基本工具。是人類文化的基本構件。人類所有的文化現象都可以在語言中得到反映，因此，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基礎，語言和他賴以生存的文化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fish** 與魚的文化內涵在中英文化的喻義更是大相徑庭。漢語中，魚同「餘」諧音，「連年有餘」是吉祥用語。中國人過春節時除夕夜的餐桌上不能沒有魚。據說，即使在不出產魚的山區，人們也用木頭刻成魚的形狀，擺在餐桌上，以此表達連年有餘（魚）的良好企盼。而在英語中 **fish** 含有貶義色彩，一般用來形容不好的人和事，如 **a poor fish**（可憐蟲），**a loose fish**（生活放蕩的女人），**fish in the air**（水中撈月，緣木求魚），**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矮子裏面拔將軍，矮個子裏面

的高個子，「不得已而求其次」)。這些都帶有貶義。

商品銷往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文化差異必然反映到語言中，商標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種文化。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民族風情，對美好吉祥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些在漢語中視為美好吉祥的動物在英語中可能引起相反的效果。因此各國的風俗人情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要譯出音、意俱佳，使商品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商標名，譯者必須具備較強的跨文化交際意識，衝破語言形式對等觀念的束縛。動物商標的翻譯並不注重表層等值，而是在於文化符號形象內涵的傳遞，只要能譯出的商標能夠反映原文的交流效果，譯名就可以接受。

3. 諧音翻譯在動物商標翻譯中的應用

諧音取意法是翻譯時在同義詞或近義詞中選取有吉祥之意的字眼來組詞，以適應顧客購物時祈求幸福、平安、舒適的心理。這是「文字翻譯」與「文化翻譯」的鮮明體現與完美結合。中國有一種電扇商標名為「蝙蝠」，是因為「蝠」與「福」同音，被認作是吉祥的動物。在日本及韓國，蝙蝠也象徵幸福。但若照此譯為 **Bat** 就會引起西方人的反感，因為他們很討厭這種動物。它使人聯想到醜陋與罪惡，所以英語中凡帶有 **bat** 的習語都含有貶義，如 **as blind as a bat**（有眼無珠），**have bats in the belfry**（發呆，異想天開），**bat** 成了睜眼睛、呆子的典型形象。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蝙蝠則是吉祥物。

翻譯時不但要準確還要富有創造性，所以選詞用字非常重要。簡潔又悅人視聽的譯名能引起人們美好的心理反應：“**Dove**”商標的翻譯最能說明這一點。它既是化妝用品的品牌又是巧克力的商標，作為化妝用品的商

標，我們將它譯成「多芬」，取其潤膚芬芳之意；作為巧克力的商標，我們將其譯成「德芙」，這同中國的“得福”（多福多壽之意）的諧音，再加上「牛奶香濃，絲般感受」的廣告詞，還未入口，我們就已經感受到他那濃濃的牛奶味了。這兩種翻譯都比我們直接將它成「鴿子」好得多。

「音譯」是中文翻譯中吸收外來語的一種特殊方式。在不違反目標市場語言規範和不引起錯誤聯想的條件下，按照原語商標的發音找到與之語音近似的漢語字詞進行翻譯的方法。「音譯」不僅僅限於字形的轉換，字音的複製。它還涉及到諧音的運用，目標市場消費者的接受程度，他們的文化背景等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新技術大量湧入，新知識的廣泛傳播，使人們不可能句句斟酌，字字考慮來找到適合本民族語言的對應詞。使用一個「音譯」的外來語，同時也就帶入了某種文化。對於幅員遼闊的國家來說，「音譯」所選擇的詞要適應整個目標市場的國家，而不能僅僅適應某一個地區或者城市。一個民族。這樣的「音譯」不利於商品在目標市場國家的推廣。**Marlboro-萬寶路**（香煙）這個品牌翻譯成「萬寶路」，使人們產生「財源滾滾而來的」美好遐想。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消費者的心理。

在東方文化中，「獅」與「失」音譯容易引起費解甚至誤解。如 **Goldlion** 金利來男子服飾原譯名「金獅」易產生「金失」，「今死」令人忌諱的聯想。獅與「失」諧音，「失」不符合中國人的文化習慣。中國商標中經常含有諸如「美」、「旺」、「嘉」、「福」等字眼，莫不反映出人們的審美取向。國人多以「聚」為快事，以「失」為悲哀。因此，如果譯成「金獅」會引起人們的負面聯想。對商家而言「失」是不吉利的，而「利來」又意味著財源滾滾而來。對於這個商標譯者沒有採用譯意的辦法而是採用部分音譯部分譯意的辦法。譯者將前半部分 **Gold** 譯成了「金」而後半部分採用了音譯的辦法「利來」。「金利來」這樣的翻譯正好迎合了中國老百姓求吉求利

的心理，因而受到歡迎。

廈門金龍客車也採取諧音翻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將「金龍」譯成了 King Long，「金」改譯成了 King，「龍」則採用了音譯的方法“long”。在外國人的眼中國王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因此翻譯為 King 可以表現出「最好的、最有權威的」含義，Long 表示了該產品經久耐用的特點。而且這兩個詞都是英語中常用的詞，其含義明瞭，耐人尋味，而且譯法也符合英國人的文化習慣。

在翻譯時選取聽起來悅耳，看起來悅目，讀起來上口的漢語代替相應的外國語音，既可以保留原來商標的音韻之美，又可以體現商品中所擁有的異國情調並給人以種種美好的遐想和啟示，給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4. 同一動物在不同國家中的聯想差異

民族心理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衍變過程中由民族文化積澱而成的心理特徵。同一動物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寓意。因此，不同的民族會對客觀世界有著各自不同的認識和審美觀，因而對同一理性概念的詞會產生附加在辭彙本身概念上的不同聯想意義。中國傳統出口商品中有不少是以動物命名的，但不同的民族對同一種動物會產生不同的聯想。中國人的心目中敢於搏擊風流的海燕是勇敢無畏的象徵，故在出口商品中常用 Petrel 作商標。殊不知西方人對海燕並無好感，在他們心目中海燕是一種「社交圈裏專門挑撥和興風作浪的人」(person whose presence excites discontentment quarrelling, etc. in a social group)。再比如：某廠生產收音機與音響設備，將品牌「喜鵲」譯成 Magpie。「喜鵲」在我國是吉祥鳥，傳說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織女銀河相會，喜鵲群集搭橋。中國民間認為喜鵲報喜，喜鵲登枝肯定有喜事要來。人們把它與喜事、吉利、運氣聯繫在一起。

常說：「喜鵲叫，喜事到」，喜鵲臨門是令人高興的事。而英語中卻用來比喻喋喋不休令人厭煩的人，叫聲討人厭，往巢裏叨亂七八糟的東西的鳥，常用來比喻愛捨破爛、不捨得扔東西的人，或比喻愛嘮叨、管不住嘴巴的人。這樣「吵人」的電器怎麼能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瑞典人把它與巫術聯繫在一起，蘇格蘭人則認為喜鵲上門預示著死亡。

「龍」是中西方神話傳說中的動物。對此中西方文化也有不盡相同的喻意。中文裏吉祥、尊貴的「龍」與英文中邪惡兇殘的 **dragon**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文化中，「龍」有幾千年的歷史了。「龍」象徵著吉祥、權威、高貴和繁榮。龍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圖騰形象，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在封建社會，龍是帝王的象徵，歷代皇帝都把自己稱為「真龍天子」。時至今日，龍在中國人民心中仍是至高無上的，我們把自己的國家稱作「東方巨龍」，龍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漢語中有大量的關於龍的成語，諸如「龍騰虎躍」，「龍飛鳳舞」，「龍鳳呈祥」，「龍蟠虎踞」都展現了「龍」在漢文化中的內涵。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們卻認為 **dragon** 是邪惡的代表，是一種猙獰的怪獸，是惡魔的化身，令人感到恐怖。「龍」很早就被用作戰爭的旗幟。《聖經》中撒旦被稱為 **dragon**。在英語中說一個人有點像 **dragon** 是說此人飛揚跋扈令人討厭。英語中還稱兇暴的女人為 **dragon**，如 *She is a real dragon, you'd better keep away from her* (她是兇狠的母夜叉，最好離她遠點)。中英文化的差異使同一動物詞有不同的內涵，給人帶來的聯想截然不同。所以試想如果把「龍」譯成 **dragon** 並作為外銷產品的商標，怎能不引起外國人的反感呢？人們若想用英語表達漢語中的「龍」這一概念，最好將其譯成 **the Chinese dragon** 或者改換其他譯法，例如按照部分音譯部分譯意的辦法。

Turtle（龜）在日本象徵長壽，但其他許多國家則視其為醜惡。伊斯蘭教國家對 **Panda**（熊貓）很反感，因為它長得和豬相像。**Elephant**（大象）

在東南亞國家深受喜愛，而在歐美人眼中卻變得呆頭呆腦。Crane（仙鶴）在我國同樣象徵吉祥、美好，但在法國，「仙鶴」是「淫婦」的代稱。所以中國產品如要銷往法國，便不能使用上面這樣的商標或相應的動物圖案。

又如，「白象」牌電池在我國很受歡迎，但直譯成英文“White Elephant”卻有「廢物」的含義。而「白象」一詞在東南亞國家具有特別意義，由於白象數量極少故而極為珍貴。在這些國家，如果一個部落的首長要使另一個部落的首長傾家蕩產，不需花費更多的力量，只需送其一只白象即可。而對方則在收到白象之後定會悉心養護，即便是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故此，「白象」一詞在這些國家中還具有令對方傾家蕩產的含義，在知道「白象」一詞的這層含意之後，「白象」電池在國際市場上出現滯銷便不足為奇了。

通過英漢動物詞文化內涵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一種語言中的動物辭彙都不僅僅是動物形象的符號代表，文化差異給動物辭彙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記。動物辭彙也因此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動物商標的翻譯要符合接受國人們的審美情趣和心理，以便在消費者心中定位。從審美心理來講，人們一旦進入對美的欣賞或感知時便會產生一種期待的心理，所以出口商品的商標翻譯要遵循商品使用國人們的文化習俗。

5. 動物商標翻譯的用詞及語用意義

一些動物商標對漢語讀者來說，文雅尊貴，情深意濃，但對英文讀者來說不一定。在中國，孔雀象徵著美麗和豔麗的色彩。“Peacock”（孔雀，通常指的是雄孔雀）是我們喜歡用的動物商標，認為它象徵吉祥、美好。用「孔雀」作電視的商標是暗指電視的色彩逼真，品質上乘。因此「孔雀」

這個商標在漢語中十分幽雅。但是，在英美國家中「孔雀」常被認為污穢、猥褻之鳥，意味驕傲、炫耀、洋洋自得。常給人帶來厄運。孔雀開屏被認為是自滿、自傲的表現，因此，英語中就有諸如 *as proud as a peacock*（非常高傲），*play the peacock*（沾沾自喜）之類的說法。英語中用 *peacock* 做商標會損害商品的形象，如果把「孔雀」譯作 *peafowl* 或者 *peahen* 就可以避免這種貶義。

在中國「蝴蝶」象徵友誼與愛情，而英語國家的人們視蝴蝶為輕浮之物，多用來指比較輕浮的婦女。如：*a social butterfly*（交際花）。若以 *butterfly* 作商標，英語國家的消費者也許會對該產品的耐用性缺乏信心。何況西方國家的人們並不喜歡以鳥或蟲類作為商標的產品，鳥、蟲用作商標往往給人一種品質低劣的聯想。

將商標「駿馬」譯成 *Junma*，這種拼音的翻譯沒有反映出商標的文化內涵，是譯者貪圖省事的例證。「駿馬」可以譯成 *courser*（詩歌用詞）*steed*, *fine horse* 均可。

「五羊」是廣州的標誌，傳說神仙送給廣州的五隻羊，給廣州揹運稻米，使其從此衣食無憂。廣州的許多產品都以「五羊」作為商標，如：手錶、肥皂、自行車，味精等等。五羊的「羊」字，譯成了 *ram*，而 *ram* 在英語中是愛打架的「公羊」，引申為「魯莽」、「莽撞」，如 *The car rammed into wall. The driver rammed the car into the wall* 一輛以 *Fire Rams* 為商標的交通工具會給人造成撞車的聯想。英語的消費者自然不會購買這種品牌的交通工具。若把「五羊」譯成 *Five Goats* 問題就解決了，同時這也同廣州越秀公園內的五羊石雕的英文名字一致了。

Wild Turkey（野火雞）是美國最佳產品威士忌酒的商標。野火雞是美國土生土長的獨特的鳥，也是美國人每年歡慶「感恩節」用餐時一種必備的食品。本傑明·佛蘭克林甚至認為把火雞作為美國的象徵比禿鷹更合

適。商家選用野火雞作為美國威士忌酒的標誌，比喻威士忌酒像野火雞一樣是人們用餐的必備佳品，在美國人心目中佔有獨特地位。

大家熟悉的品牌轎車 bluebird 通常譯為「藍鳥」，也是一個含義美好、寓意優雅的商標翻譯。「藍鳥」一詞來源於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terlinek）於 1911 年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童話劇「藍鳥」，劇中「藍鳥」象徵「未來幸福」，用它來做轎車的商標，也象徵著幸福之源。這個商標的翻譯較好的表達了原商標的含義，而且簡潔易懂，與原商標具有同樣的促銷功能。

一般意義上講語用意義是指語言在實際運用時所蘊含的意義，它與其使用的語境和其存在的社會文化密切相關。不言而喻，考察商標語言的語用意義必須以它存在的文化語境為依託。在漢文化中，狗是屢遭譏諷的東西，代表卑劣可惡的品性。帶有狗字的詞語明顯具有貶義色彩，如走狗、狼心狗肺、狐朋狗友、喪家狗、狗仗人勢、狗咬狗等。而狗在英語中大多數場合是褒義詞，可用來形容值得同情信賴的人，如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l（助人度過難關），a lucky dog（幸運兒），an old dog（老手），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很顯然，這些說法反映了英國人的文化心理，他們視狗為可愛的同伴，人類最好的朋友，如 as faithful as a dog 就是用來形容人的忠誠。另一個以狗為商標的例子是 Gray hound（灰狗）。Gray hound 是美國長途汽車標誌，在美國文化中，灰狗是一種身體細長、快速、敏捷、善於賽跑的獵狗。以 Gray hound 為商標命名長途汽車，其語用意義是這種汽車經濟快捷，方便舒適，給人以生動形象的聯想。有助於人們產生欲乘坐的心理。但若將 Gray hound 譯為「灰狗」就不會受中國人歡迎，原語用意義也就蕩然無存。

同樣由於文化差異，漢語商標詞的語用意義譯成英語後也可能喪失。例如：玉兔在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是陪伴嫦娥生活在月宮裏桂花樹下的兔

子，令人產生的聯想是「嫦娥奔月」的故事，玉兔也由此成為月亮的代名詞，若將玉兔商標譯成 **Jade Rabbit** 就失去其語用意義。而譯成 **Moon Rabbit** 儘管不能完全體現文化蘊含，至少可以減少語用損失。可見社會文化不同，人們觀察概括事物各有自己的視角和審美觀，使用語言的規範也不相同。一方面，不同國家和地區會用不同事物表達相同的語用意義。如，虎在漢文化中是百獸之王，漢語中許多帶「虎」字的詞語就體現了這一喻義，但在英語裏「虎」的地位被「獅」所取代，眾多以獅為喻體的詞語足以說明「獅」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

6. 結束語

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化，更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動物商標作為一種標誌語言，給翻譯提供了一個很大的自由空間，但是這要限制在文字優美，音韻和諧、動物寓意基本保持在原文內涵的範圍內。正如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所指出的那樣：「對於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具有意義」。

由於每一種文化都會接納新的東西，不論是外來的，還是產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將這些新的東西加以重新塑造。因此，動物商標的翻譯要注重文化移情，這樣有利於溝通消費者的民族心理認同感，激發消費者的新奇、嘗試心理和購買欲望，有積極的促銷作用。

動物商標的翻譯可以採取音譯與意譯結合的辦法，在翻譯商標時尊重和把握消費國民族心理差異，洞察譯名所造成的聯想，注重該動物的文化內涵，弘揚各個國家優秀文化。確定該國的消費群體，精選褒義詞語，結合商品特徵，反映出該商品的資訊，所用語言樸實規範，節奏簡潔明快，

是動物商標的翻譯原則。雖然存在著諸多的差異但在商標命名方面求雅棄俗，取吉避凶的原則是各國消費者的共同心理。

總之，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差異、思維方式差異和語言聯想差異是動物商標翻譯中所要注重的核心之核心。它一方面決定著廣告人的理念、審美觀，另一方面也決定著目標市場消費者的消費觀和審美情趣。因此，在動物商標翻譯過程中，譯者要胸懷差異，遵循商標翻譯的原則，靈活採用多種翻譯方法，譯出的譯語應是消費者樂於接受的商標譯名，從而更好地實現東西文化的互跨和融合。

參考書目

- 朱小菊。〈出口商標名稱和商標的翻譯〉。《中國科技翻譯》5(1999年): 49-52。
- 吳偉雄。〈何必譯“龍”為“虎”？〉。《上海科技翻譯》第2期(2000年): 51-53。
- 單文波。〈從文化差異看英漢商標詞翻譯的原則〉。《內江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2009年): 77-79。
- 蔣 磊。〈文化差異與商標翻譯的語用失誤〉。《中國科技翻譯》第3期(2002年): 52-56。
- 劉法公。〈論商標漢英翻譯的幾個關鍵問題〉。《中國翻譯》第6期(2003年): 68-71。
- 劉法公。《商貿漢英翻譯專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